

Autumn 2014



亚洲研究动态

Asia Research Network

September No.26

2014年9月 第二十六期



亚洲研究动态 Asia Research Network

第 26 期
2014 年 9 月

主编：郭棲庆 赵宗锋
编辑：王惠英
设计：大达期刊设计公司
E-mail: icwar@bfsu.edu.cn
电话：86-10-88813845
传真：86-10-88813842
地址：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2 号，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100089

出版人

朴仁国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
杨学义 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理事长

编委会顾问

王恩哥 北京大学校长
陈吉宁 清华大学校长
李 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陈雨露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杨玉良 复旦大学校长
龚 克 南开大学校长
杨学义 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理事长
苏志武 中国传媒大学校长
黄泰岩 辽宁大学校长
朴永浩 延边大学校长
林建华 浙江大学校长
Phung Xuan Nha 越南国立大学校长
Piom Kamol-Ratanakul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校长
Khlot Thyda 柬埔寨皇家学院院长
Soukkongseng Saignaleuth 老挝国立大学校长
Artbazar Galtbayar 蒙古国立大学校长
Tin Tun 缅甸仰光大学校长

编辑委员会

吴志攀 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院长
李 越 清华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周云帆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伊志宏 中国人民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金光耀 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杨 龙 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金 莉 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
丁俊杰 中国传媒大学亚洲传媒研究中心主任
陆杰荣 辽宁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金强一 延边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罗卫东 浙江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Bouadam Sengkhamkhoutlavong 老挝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Kyaw Naing 缅甸仰光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Prapin Manomaivibool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Javzan Batkhuu 蒙古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Sum Chhum Bun 柬埔寨皇家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Nguyen Thi Anh Thu 越南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张西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
郭棲庆 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语言与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兼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副主任
赵宗锋 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执行副主任

CONTENTS

目录



P.02

→ 2014年6月4日下午，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与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举办的“中国文化在亚洲”系列学术讲座第五讲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



P.04

→ 18世纪欧洲刊行的关于中国的书籍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即长住巴黎的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主编的《中华帝国及其鞑靼地区地理、历史、编年、政治、自然之描述》中译习惯上简称《中华帝国全志》。

学术活动

- 02 “中国文化在亚洲”系列学术讲座5—7举行

研究进展

- 04 浅论《中华帝国全志》的汉学价值
11 《史记》在俄罗斯的收藏与翻译
24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科研资助项目介绍

学者与著作

- 37 泰国现代文学史



范圣宇



吴骏

“中国文化在亚洲” 系列学术讲座 5—7 举行

2014年6月4日下午,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与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举办的“中国文化在亚洲”系列学术讲座第五讲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澳洲国立大学中文系讲师范圣宇博士作了题为“霍克思/闵福德译《红楼梦》汉英对照版的校勘”的学术讲座。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顾钧教授主持讲座并致辞。

范圣宇博士著有《红楼梦管窥——英译、语言与文化》一书,并对霍克思/闵福德译《红楼梦》汉英对照版进行了校勘工作。

本次讲座,范圣宇博士从自己对霍克思/闵福德译《红楼梦》汉英对照版所进行的校勘工作谈起,结合自己校勘时的实例生动地介绍

了校勘的处理方法: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校勘工作主要有三个部分:一是发现错误,二是改正,三是证明所改不误。在校勘工作中,校勘者需要对作者、读者、文本、译者负责。范圣宇博士还向大家展示了他进行校勘时所用的各种版本的《红楼梦》。

最后,范圣宇博士对现场师生所提问题进行了细致的回答。

2014年6月16日下午,“中国文化在亚洲”系列学术讲座第六讲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三层学术报告厅举行。来自博鳌亚洲论坛的执行总监、北外校友吴骏为北外学子作了题为“博鳌亚洲论坛与亚洲文化发展”的讲座。



章建刚

吴骏首先简单地介绍了自己在北外的学习经历，然后谈到了博鳌亚洲论坛的创办和发展历程，以及2014年博鳌亚洲论坛的新进展。随后，他结合本人的学习背景，与现场师生分享了自己对亚洲文化特点的看法。最后，吴骏将博鳌亚洲论坛与亚洲文化发展结合，阐述了文化在经济互动发展中的重要性，特别提到了2014年博鳌亚洲论坛对文化议题的重视，并强调了北外在文化交流上的独特优势，对北外学子进行了勉励。

讲座结束后，吴骏与学生们就博鳌亚洲论坛及亚洲文化问题进行了互动。

吴骏出生于江苏苏州，于1984—1989年在北外亚非语系泰语专业学习（1987—1989年任校学生会主席、北京市学联副主席、全国学联副主席）。1989年至2007年在外交部亚洲司工作，历任亚洲司副处长、处长、中国驻泰国使馆一秘、政务参赞、亚洲司参赞等职，2007—2008年挂职贵州省清镇市委常委、副市长，2008—2010年任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研

究局副局长，2010年至今任博鳌亚洲论坛执行总监。

2014年6月24日下午，“中国文化在亚洲”系列学术讲座第七讲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三层学术报告厅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章建刚研究员应邀作了题为“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国际化趋势与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的学术报告。

章建刚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理事、副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美学室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化蓝皮书》主编、上海交通大学特聘研究员。近年来他主要从事文化发展理论研究，涉及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体制改革、公共文化服务、文化多样性及文化遗产保护、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发展、创意城市及城市景观营造等专题，相关研究成果有《制度创新，推动文化发展繁荣》（云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及《文化经济学视野的搭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月）等。近年来章建刚积极服务于国家及地方文化发展，一直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的相关工作，并受聘为文化部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专家委员会成员。

本次讲座，章建刚从《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谈起，对“文化多样性保护”进行了三种论证，讨论了《公约》在实际应用中的适用范围以及对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一些借鉴经验，最后章建刚就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提出了几点建设性的对策和建议。

讲座结束后，章建刚与现场学生进行了互动，并耐心认真地解答了学生们的提问。

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浅论《中华帝国全志》的汉学价值¹

张明明 /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18世纪欧洲刊行的关于中国的书籍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即长住巴黎的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 1674—1743）主编的《中华帝国及其鞑靼地区地理、历史、编年、政治、自然之描述》（*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中译习惯上简称《中华帝国全志》）。这部规模空前的汉学著作于1735年首刊于巴黎，在很长时间里都是欧洲人关于遥远的中华帝国的重要信息来源，因其在西方汉学发展史上的地位，被视为“西方早期汉学三大

1 本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科研资助项目《〈中华帝国全志〉研究》的研究成果。

名著”之一。¹ 本文即尝试分析《中华帝国全志》所传播的中国知识的新旧、深浅、广窄，希望对评价这部“汉学名著”在西方汉学谱系上的价值有所助益。

一、知识的陈旧及谬误

无可讳言，《中华帝国全志》所载中国知识有其陈旧的一面。它所收录和征引的汉学作品，时间跨度近一个世纪，不少章节仅是已刊作品的再刊或转译。例如，杜赫德所列的27名传教士供稿者²名单中，有16人的信件曾收入《耶稣会士书简集》，杜赫德从中挑选了51封用于《中华帝国全志》。在1735年之前，27位供稿者中8人的29部作品已先后出版，其中一些后又收入《中华帝国全志》。³实际上，不只是正文，在序言等说明性文字中

本文即尝试分析《中华帝国全志》所传播的中国知识的新旧、深浅、广窄，希望对评价这部“汉学名著”在西方汉学谱系上的价值有所助益。

杜赫德也参考了会友的著述。当然，考虑到杜赫德从未亲身履迹中国，且不通中文，这些参考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华帝国全志》知识陈旧的缺陷如此明显，以至于自发行之日起，便被指摘为缺乏原创性。同时代学者弗雷莱(Nicolas Fréret, 1688—1749)⁴于该书出版当年在致在华耶稣会士宋君荣(Antoine Gaubil, 1689—1759)的

信中批评该书：“有人似乎设法扩大规模而未增加材料，在其中找不到任何其他书中所没有的内容。”⁵后世学者毕诺(Virgile Pinot)的论断同样绝对：“《中华帝国全志》在它出版问世的时代，未为学者们提供任何新内容。他仅为了那些一知半解的学者和上流社会人士，才对耶稣会士们有关中国旧作中最有意义的内容重新订稿，如《耶稣会士书简集》和李明神父的《中国现势新志》。它们集已获得的中国知识之大成，但其中有些知识是很久以前就已获得的，而不是新的发现。”⁶另有不少人也对《中华帝国全志》的新颖程度不尽满意。⁷

《中华帝国全志》出版15年后，宋君荣在致巴黎学者德利尔(Joseph-Nicolas Delisle, 1688—1768)的信中仍对杜赫德在讲说中国经书时未采用

1 另两部著作分别为：法国耶稣会士郭弼恩(Charles Le Gobien, 1671—1708)、杜赫德以及巴黎主教巴杜耶(Louis Patouillet, 1699—1779)先后主编的《有益而有趣的书信》(*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écrites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par quelques missionnaire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1702—1776)，中译习称《耶稣会士书简集》，1702年至1711年的1—8卷由郭弼恩主编，1711年至1743年的9—26卷由杜赫德主编，1746年—1776年的27—34卷由帕杜耶主编；法国学者巴赛(Charles Batteux, 1713—1780)、布列基尼(Louis-Georges de Bréquigny, 1714—1794)等主编的《北京耶稣会士中国论集》(*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les arts, les moeurs et les usages des Chinois par les Missionnaires de Pékin*, 1776—1814，一译《中国杂纂》)。需要指出的是，《耶稣会士书简集》所刊耶稣会士信件来自世界各地，其中约有三分之一涉及中国。参见许明龙著：《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第73—77页；张国刚著：《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61页。关于对《中华帝国全志》的定位，另见莫东寅著：《汉学发达史》，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65页；何寅、许光华主编：《国外汉学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3—85页。

2 此处的“供稿者”系法文词 *contributeur* 的意译，不宜全按字面理解，因为杜赫德编纂《中华帝国全志》，常常自由处置传教士稿件，部分作者的主观提供意愿不一定很强，且当时部分作者已亡故。

3 Landry-Deron, Isabelle, *La preuve par la Chine, La « Description » de J.-B. Du Halde, jésuite, 1735*, Paris, Édition de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2002, pp. 53—56.

4 关于弗雷莱及其中国研究，可参见 Danielle Elisseeff, *Nicolas Fréret (1688—1749) : Réflexions d'un humaniste du XVIIIe siècle sur la Chine*, Paris: Collège de France, 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1978 及 Joseph Dehergne, «Le Père Gaubil et ses correspondants (1689—1759)», in *Bulletin de l'Université l'Aurore*, 1944, Série III, Tome V-No. 1, pp. 371—372.

5 Pinot, Virgile, *Documents inédits relatifs à la connaissance de la Chine en France de 1685 à 1740*, Paris: 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 1932, p. 73.

6 【法】毕诺著，耿昇译：《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06—207页。

7 参见张国刚著：《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76—277页。

入华耶稣会士雷孝思 (Jean-Baptiste Régis, 1663—1738)《经史导论》(Notice des King) 这样的新材料感到不解：

雷孝思神父的《经史导论》是一部同您所谓的该神父所完成的经书翻译全然不同的作品。在杜赫德神父进行编辑工作之时，《经史导论》就在他那里，他本应从该书中提取材料撰写诸经导论。他实际所说的关于诸经的话太过肤浅了，我无法明白，他为何对雷孝思神父的作品置之不理，为何忽略了《经史导论》，这本应在他的书中居于第二重要的位置，仅仅排在地理之后。¹

此外，根据 1736 年海牙版《中华帝国全志》的“声明”，1735 年巴黎初版甫刊，即有人质疑该书所言无非是从前著作说过的陈词滥调。为了证明该书的价值，海牙版刊者特意编排了一份 1531 年以来欧洲出版的关于中国的 96 种著作的名录，附于该版之后，希望人们通过比照，获知《中华帝国全志》的价值。²

那么，杜赫德编纂一部“知识陈旧”的汉学著作的用意何在呢？至少有如下可能：

为了证明该书的价值，海牙版刊者特意编排了一份 1531 年以来欧洲出版的关于中国的 96 种著作的名录，附于该版之后，希望人们通过比照，获知《中华帝国全志》的价值。

首先，出于编纂一部“百科全书”的考虑，求全是题中应有之义，联系到当时远东到西欧的信息传播效率，难以保证在编纂之时各门类的中国知识都有了新材料和新发现，为了求全而起用几十年前的著作也属自然。

其次，自利玛窦 (Matteo Ricci, 1552—1610)、金尼阁 (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天主教远征中国史》(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³ 流行以来，耶稣会士长期致力于发表著述向公众介绍中国，逐渐博得了“了解中国”的名声，并获得了忠实的读者群。杜赫德编辑《中华帝国全志》的时代，供稿者名单上排名前列的传教士已为不少人所知，杜赫德收

入这些几十年前的作品，不排除意欲借重诸人名声表彰其作的可能。⁴

再次，杜赫德也应从该书影响的角度做过考虑。他手中并非没有较新颖的著述，例如，在很久之前就收到了上述的《经史导论》。这部考证性著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杜赫德却并未收录，而仅仅满足于在《中华帝国全志》中引用一些含糊的句子，对中国经书进行简略的介绍。原因之一恐怕在于，雷孝思的著作学术性过专过强，不易为多数读者所接受，这同样也可能是那个时代几位入华耶稣会士的作品如宋君荣的《书经》译本 (Le Chou-King)⁵、《中国年代论》(Traité de la Chronologie chinoise)⁶、冯秉正 (Joseph-Anne-Marie de Mailla, 1669—1748) 的《中国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ou Annales de cet Empire)⁷ 以及马若瑟 (Joseph-Henry de Prémare, 1666—1736) 的大量著作未获即刻刊行的理由。原因之二恐怕是受制于当时的思想社会环境，以《经史导论》为代表的一些著作不获刊行，多少也是为了避免在敏感话题上激化与秉持异见者之间的矛盾。⁸

1 Gaubil, Antoine, *Correspondance de Pékin 1722—1759*, publiée par Renée Simon, Genève: Librairie Droz, 1970, p. 674.

2 Landry-Deron, *La preuve par la Chine*, p. 379.

3 *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 suscepta ab Societate Jesu*, Augsburg, 1615.

4 Landry-Deron, *La preuve par la Chine*, pp. 53—57.

5 *Le Chou-King: un des livres sacrés des Chinois, qui renferme les fondements de leur ancienne histoire, les principes de leur gouvernement & de leur morale*, Paris, 1770.

6 *Traité de la Chronologie chinoise*, Paris, 1814.

7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ou Annales de cet Empire*; traduit du Tong-kien-kang-mou par de Mailla, Paris, 1777—1783.

8 【法】毕诺著：《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第 160—163，182—198 页。

除知识陈旧外，以当时中欧文化交流的知识积累状况、交流便利程度以及《中华帝国全志》的巨大篇幅而论，该书在传播中国知识方面时有重复及舛误之处也算自然。重复的出现，作为编者的杜赫德多少负有责任，但是对于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中国了解不多的欧洲读者来说，反复的解说却也正可起到灌输、确证知识的作用。而不识中文的编者杜赫德未能纠正原稿的舛误之处也属难免。

我们先看重复之处。例如，《中华帝国全志》第二卷讨论过中国五经，第三卷开篇讨论中国人之信仰时，再次对五经进行基本性介绍。¹此外，对个别汉字反复解说的现象也不少见，例如，对作经典讲的“经”（king）字多次作解。²

再来看舛误之处，至少有以下两类：

第一，拼写不一。如第二卷“中国文学”部分《书经》译文记商代高宗名为 Cao tsong，³第三卷“论中国人之信仰”部分引高宗寻傅说事，则作 Kao tsong。⁴当然，这或许是因不同篇章系出自不同供稿者之手的缘故，但编者杜赫德也未能作最后的统一。



第二，史实性错误。如误以成汤（Tching tang）为黄帝之孙，⁵以太甲为成汤之子，⁶以武帝为汉朝第六帝，⁷等等。

二、旧题的深入

以上讨论了《中华帝国全志》所载知识过旧的缺陷，但《中华帝国全志》是否真如部分学者所说的“毫无新意”？事实并非如此。作为刊于18世纪中叶的篇幅浩大、材源广泛的巨著，《中华帝国全志》的材源占有量超过以往的汉学著作，多年批阅资料、编纂《耶稣会士书简集》的经验足以为编者杜赫德建立起富于甄别性的眼光，欧洲

早期汉学第二阶段的发展也为《中华帝国全志》的编纂铺垫了新的经验和视角，⁸尽管受制于某些因素，该书收录了大量旧作，但至少在一些旧有领域中和探讨方式上，它还是传达出了深入的态势。

第一，在地理方面，较此前许多汉学著作更为进步的是，《中华帝国全志》更详细地列举了各省所辖府、县数目，并对许多重要城市进行了介绍。在叙述各省自然地理、人文风物时，《中华帝国全志》对各省特点也有较深的体察，如叙述江南省时，提及该省居民聪慧有礼，因学而官者众多。⁹这

1 Du Halde, *Jean-Baptiste,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Paris, 1735, v. III, pp. 2—3.

2 Du Halde, *Description de la Chine*, v. III, p. 30.

3 Du Halde, *Description de la Chine*, v. II, p. 305.

4 Du Halde, *Description de la Chine*, v. III, p. 14.

5 Du Halde, *Description de la Chine*, v. III, p. 9.

6 Du Halde, *Description de la Chine*, v. II, p. 304.

7 Du Halde, *Description de la Chine*, v. III, p. 17.

8 关于早期汉学两个阶段的划分，参见计翔翔著：《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0—53页。

9 Du Halde, *Description de la Chine*, v. I, p. 127.



样就使欧洲读者对中国各省的了解不再停留于诸如名称、面积、人口等统计数据上，而为他们树立起更为立体的印象。另如，在叙述当时中国北直隶省下设府数之时，《中华帝国全志》向欧洲提供的地理信息的时间跨度在1693至1731年间，¹虽稍显过时，然而以当时的信息传播速度而观，也不可谓过于陈旧。

特别是由王家地理师丹维尔（Jean-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 1697—1782）刻板的中国总图及分省图在《中华帝国全志》中首次出版，这项空前的汉学成就属于该书的一大功绩。各地图所包括的中国疆域

为自1689年《尼布楚条约》之后至1860年间的疆域，新刊地图刷新了来华传教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1614—1661）、白乃心（Johann Grueber, 1623—1680）、卫方济（François Noël, 1651—1729）诸人在欧洲传播的中国地理知识。卫匡国刊于1655年的《中国新图》（*Novus Atlas Sinensis*）届时已刊80年，白乃心作品收于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 1602—1680）的《中国图说》（*China Illustrata*, 1670）中，而卫方济所做的经度计算收于1710年在布拉格发行的《印度、中国数学物理观察》（*Observationes Mathematicae & Physicae in India & China*）。²与三者

相比，《中华帝国全志》所收地图在深度和时效性上均有进步。除地图本身之外，参加测绘的传教士借助这一难得的机会，对当时中国从内地到边疆的自然条件、风土人情、经济交通等均作了实地考察，掌握了第一手资料，这也为西方汉学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材料。³认为在《中华帝国全志》中“找不到任何其他书中所没有的内容”的学者弗雷莱也承认，该书所收地图是“最全面的地图”。⁴

第二，在思想方面，《中华帝国全志》冲破了此前传教士独尊古儒、孔子的传统，思想更加开放，尽管在总基调上基本与前辈保持一样，但不再

1 据复旦大学林涓博士研究，清代初年，北直隶尚沿明制，领八府（顺天府、保定府、河间府、真定府、广平府、顺德府、大名府、永平府）、二直隶州（延庆直隶州、保安直隶州）、一镇（宣府镇）。直至康熙三十二年（1693），裁宣府镇改置宣化府，方有九府之数。又雍正九年（1731），升天津直隶州为天津府，遂有领十府。见林涓：《清代行政区划变迁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第108页。《中华帝国全志》讲述北直隶区划时，即载包括宣化府在内的九府之数。见 Du Halde, *Description de la Chine*, v. I, p. 7.

2 Landry-Deron, *La preuve par la Chine*, p. 143.

3 计翔翔著：《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第47—48页。

4 Pinot, *Documents inédits relatifs à la connaissance de la Chine en France de 1685 à 1740*, p. 77.

回避孟子、宋儒，这使欧洲读者得以更加全面和客观地了解中国思想的发展脉络。¹此外，《中华帝国全志》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收录了中国多个时期的文献的译作，使欧洲读者对中国思想能有更直观和深入的认识。

第三，在文学方面，如果说《中华帝国全志》对中国文学篇幅简短的总体概述较之此前著作并无特异之处，那么，该书所首次收入的译自明代小说集《今古奇观》的三部小说以及元代杂剧《赵氏孤儿》²，则为欧洲读者提供了关于中国小说、戏剧的直观文本，中国文学的面貌变得更为清晰可触，《赵氏孤儿》一剧更是在欧洲大陆广泛流布、变异，产生了较大影响。

第四，在行文间隙，《中华帝国全志》或在正文中，或通过边脚注的形式，以极大的规模加入了许多关于中国的史实性解说或文化性评价。例如，第二卷《小雅·正月》译文起首注云：“古诗中如此颂诗起篇者颇多，亦如第四、七节之首。其文体崇高而富于诗意，整部《诗经》均如此而作，此风格更延续至今。”³又如，《书经·皋陶谟》译文中的一段：“皋陶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彰厥有常，吉哉。’”《中华帝国

贯穿《中华帝国全志》有一种可贵的中西文化比照的视角，有助于促使有识者从文明的高度，对自我和他者进行反思。无论是述及中国历史、文学、哲学等诸多方面，该书的编著者都不时引入欧洲的相应情形。

全志》注云：“此处可见古经文体之至简。十八字隐括持身九德之义，以如此生动美妙之方式出之，非吾等诸语可及。”⁴又如，《书经·大禹谟》译文选段起首加注：“帝言用自由诗体，多处无韵，句长不一。《书经》总看非诗体，然间有局部为诗体者，如此例。”⁵这些解说都在一定程度上穿透了文化的隔膜，促进了文明间的了解。

第五，贯穿《中华帝国全志》有一种可贵的中西文化比照的视角，有助于促使有识者从文明的高度，对自我和他者进行反思。无论是述及中国历史、文学、哲学等诸多方面，该书的编著者都不时引入欧洲的相应情形。从《中华帝国全志》刊行之后法国学界的反映，也可看出该书的相关价值。

法国王家科学院院刊《学者杂志》于1735年11月至次年2月间连刊四篇文章，声称：借助《中华帝国全志》，法国人对中华帝国的了解得以大大加深。该书所介绍的中国士子读书进阶程序、公学状况颇为有益，并希望法国大学对此有所借鉴。⁶可以说，这既帮助欧洲人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的方方面面，也可为欧洲人自身提供一个审视自我的全新视角，考虑到中国文化的悠久博大及其与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性，便更可看出，在当时的中西交流状况下，由《中华帝国全志》这样一部涵盖各领域的巨著所构筑的全方位审视视角是多么难能可贵。

三、范围的拓展

除了在旧有领域的深入之外，得益于汉学自身演进、学者视野渐宽的背景，有时则是受益于某些政治上的偶然机缘，如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n, 1654—170）随康熙帝出访周边地区，雷孝思等赴全国测绘地图，《中华帝国全志》的成就也表现为对新学术领域的拓展，这突出表现在科技和地理方面。

首先，在科技方面。《中华帝国全志》第三卷给出了对中国医学发展

1 参见拙文《试论〈中华帝国全志〉对儒家的描述》，载《汉学研究》第14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12年。

2 Du Halde, *Description de la Chine*, v. III, pp. 290-377.

3 Du Halde, *Description de la Chine*, v. II, p. 314.

4 Du Halde, *Description de la Chine*, v. II, p. 300.

5 Du Halde, *Description de la Chine*, v. II, p. 301.

6 Landry-Deron, *La preuve par la Chine. Appendices*, p. 378.



的总体观感，介绍了中国医学划分人体的不同标准，人体周流运行的方式，“阴”、“阳”、“经络”等中医特有的概念，中医诊断病人的方式，可以说较详细地向西方人陈说了中国医学的一些基本要点。更为重要的是，《中华帝国全志》特别收入了中国古代两部重要医学作品《脉诀》和《本草纲目》的长篇节译，¹ 欧洲读者可以借此对中国医学独特的诊疗方式和入药材料有一定的了解。这是在未对中国科技展开大规模研究的早期汉学第一阶段所未见的，不得不说是在汉学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

其次，在地理方面。按照杜赫德在1733年3月刊出的出版预告中的说

法，至《中华帝国全志》出版之前，“鞑靼地区的广阔疆域——特别是臣属于中国皇帝的部分以及西藏，我们对于这些广阔的地区几乎没有任何认识”。² 说当时欧洲人对于鞑靼、西藏等地区“几乎没有任何认识”或许夸张，但在这方面知识有限却是事实，因此《中华帝国全志》的价值便更显重要。与此前汉学著作多将目光局限于中国十余个省份不同，《中华帝国全志》第四卷通过收录亲历者的观察和探究，专用于介绍中国周边鞑靼、高丽、西藏等地，且图文并茂。《中华帝国全志》刊出这些文献的时间距这些作者旅行的时间不远，以当时的信息传播速度而论，可以说为欧洲读者送去了较具

时效性的关于中国周边民族地区的大规模信息。由于这些游记系亲历者所撰，所述内容常常为亲眼所见，许多游记的作者更是多次前赴周边地区，并往往具有关于相应地区的一定知识学养，因此这些材料便不再是浮光掠影地介绍或转抄，而是具备了一定深度。这些深度和规模是在此前汉学著作中所少见的。杜赫德自己即称，如果没有晚近传教士们因绘制地图而得以走遍中国的机会，难以发现中华帝国尚有不少荒芜之地。从前的部分传教士赞颂一些地区，只因足迹所涉只是其治下的繁华之地，而所得结论并不完整。³ 这正昭示了《中华帝国全志》在展示欧洲汉学知识的演进方面所承载的意义。

通过本文的考察，我们可约略看出：作为17、18世纪西方人看中国的阶段性集大成之作，《中华帝国全志》所传播的中国知识虽有不少过时与舛误之处，但在继承前辈传教士汉学成就的基础上还是取得了明显进步，我们可以从中明显感受到西方人对中国逐步深化的认知脉络。这些进步既源于传统领域（地理、思想、文学）新素材的积累、新研究的深入，也源自新领域（科技、周边民族）的拓展，书中的不少内容正昭示着西方早期汉学发展的某些趋向。

1 Du Halde, *Description de la Chine*, v. III, pp. 384—506.

2 Le prospectus de vente de 1733 de *la Description*, in Landry-Deron, *La preuve par la Chine*, Appendices, p. 375.

3 Du Halde, *Description de la Chine*, v. I, p. 15.



《史记》在俄罗斯的收藏与翻译¹

柳若梅 /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摘要

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史记》在18世纪被传往俄国，19世纪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带回大量中国藏书使俄藏《史记》的种类繁多，20世纪俄国和苏联时期都曾大规模来华购书，俄藏《史记》更加丰富。俄罗斯汉学家19世纪起就节译过《史记》，20世纪自1972年起启动了俄文全译注释《史记》的宏伟工程，于2010年推出了世界上惟一种欧洲语言的《史记》全文译注本。《史记》在俄罗斯被收藏、翻译的过程折射了中国文化在俄罗斯传播的历史轨迹。

关键词

《史记》 俄罗斯 收藏 翻译

1 本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科研资助项目《司马迁的〈史记〉在俄罗斯的翻译与研究》的研究成果。

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史记》不仅为中国历代史学家提供了典范，也被世界各民族广泛关注。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史记》已流传到高丽王国；在当代韩国，自1960年代中期至1999年已出版韩文《史记》翻译本（包括全译本和节译本）共20余种。¹公元7世纪，《史记》随第一批遣隋使被带入日本。日译《史记》方面，自15世纪桃源瑞仙的“国字解”《史记》至今，《史记》的全译本和选译本达上百种之多。²19世纪末，《史记》英文摘译首先出现在《皇家亚洲文会会刊》上，此后20世纪美国杂志上发表过《史记》的多种摘译本，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分别有两次大规模翻译《史记》的高潮。³20世纪70年代英国汉学家摘译过《史记·列传》中的内容，1994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英国汉学家雷蒙·道森的《史记》选译本。⁴《史记》的德文本最早见于19世纪中期，20世纪50年代《史记》多种德文摘译相继出现。

《史记》早在俄罗斯汉学起步的18世纪就传入俄境，俄文全译注释本《史记》是世界上惟一一种欧洲语言的全文译注本，《史记》自18世纪进入俄国直至21世纪被全文俄译注释的过程，折射了中国文化在俄罗斯传播的历史轨迹。

最早最大规模翻译《史记》的法国汉学家沙畹在1895—1905年间出版了《史记》卷一至四十七的法文译注本。1960年代，法译本又补充了《史记》卷四十八至五十二。⁵《史记》早在俄罗斯汉学起步的18世纪就传入俄境，俄文全译注释本《史记》是世界上惟一一种欧洲语言的全文译注本，《史记》自18世纪进入俄国直至21世纪被全文俄译注释的过程，折射了中国文化在俄罗斯传播的历史轨迹。

一、《史记》在俄罗斯的收藏

17世纪起俄国有了关于中国的确切描述。18世纪在彼得一世引领的俄国启蒙运动中，俄国同西欧在科学文化方面的密切接触将人文主义、纯理性主义思潮传入俄国知识界。欧洲热衷于从东方、中国寻找推动欧洲发展的有利因素，这直接影响着俄国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在彼得一世倡议下于1714年建立起来的珍宝馆⁶中国藏书丰富。1724年彼得堡科学院成立后，珍宝馆的藏书构成了科学院图书馆。但1747年的火灾使这些藏书毁于一旦。1753年，俄国向中国派出了履行《恰克图条约》的第六批商队⁷，科学院派出医生叶拉契奇随商队为科学院图书馆在中国补充购买书籍⁸。由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回国的科学院翻译罗索欣为叶拉契奇拟定了采购书目。此行叶拉契奇在中国滞留了3年，依书目收集到中国书籍42种，其中包括《广域记》、《大明一统志》、《史记》、《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汉书》、《北史》、《南

1 诸海星：《〈史记〉在韩国的流传及影响——以翻译介绍与研究现状为中心》，载《汉学研究通讯》（台湾）2004年第4期，第12—13页。

2 覃启勋：《论〈史记〉东渐扶桑的史学影响》，载《湖北社会科学》1988年第11期，第63页。

3 吴原元：《略述〈史记〉在美国的两次译介及影响》，载《兰州学刊》2011年第1期，第159—163页。

4 李秀英：《〈史记〉在西方：译介与研究》，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4期，第303—305页。

5 同上。

6 1703年，俄皇彼得一世将首都从莫斯科迁往新城彼得堡，彼得一世私人收藏的一些珍奇物品也同时运至彼得堡，暂时存放在皇宫夏宫。1714年建立了俄国第一家博物馆珍宝馆，其藏品中包含各种语言的书籍。随着珍奇物品的日益丰富，图书也越来越丰富。1718年专门成立了对公众开放的珍宝馆图书馆。1725年彼得一世去世后，彼得一世的图书馆和珍宝馆图书馆都转入了刚成立的科学院图书馆，成为科学院的最初藏书。

7 1727年（雍正五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其第四条规定，准两国通商，俄赴华商队人数不得超过二百人，每间三年进京一次。条约签订后俄国于1728年派出了第一批商队，1732年派出第二批商队，1736年派出第三批商队，1745年派出第五批商队，1753年派出第六批商队。

8 叶拉契奇一行是俄国首次有目的地进行中国物品收藏，从中国带回的除上述书籍外，还有中国的珍奇物品273种。由此彼得堡科学院的珍宝馆成为欧洲中国物品收藏最丰富的博物馆。但此行并没有完全弥补上1747年科学院火灾所遭受的损失，这一目标直到1768—1774年间帕拉斯率领的科学院的第二次西伯利亚考察时才得以完成。详见 Введение в этнографию,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91, стр. 161.

史》等。¹ 18世纪科学院几次为馆藏中国图书编目, 18世纪末正式出版的布塞(科学院图书馆管理员)书目显示, 当时科学院藏中国书籍计238种, 分为哲学、国家、军队类(如《书经》、《诗经》、《易经》、《礼记》、《老子》、《大清律例》等), 历史地理类(如《春秋》、《史记》、《汉书》、《明史》、《大清一统志》等), 天文和地理类, 医学类, 小说类(《金瓶梅》、《水浒传》等)、启蒙类(《千字文》等)等等²。叶拉契奇的中国购书之行是科学院首次有目的地前往中国采购图书。18世纪时期彼得堡的中国藏书量为欧洲之巨,《史记》已在其列。

19世纪俄国向中国派出的东正教使团开创了俄罗斯汉学蓬勃发展的局面。1818年, 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批准向使团颁发工作指南, 要求为使团图书馆收集图书。³ 1850年,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在驻地专辟存放图书用地⁴, 此后东正教使团成员和俄国驻华外交公使馆人员都着力于图书收集,



后来俄国政府又专门拨款为东正教驻北京使团图书馆官费购书, 1877年, 初具规模的图书馆形成。到1889年,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已拥有中文图书近八百册, 其中虽无《史记》全本, 但却藏有明代凌迪知摘录《史记》字句、按类编次而辑成的《太史华句》。⁵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成员的藏书并非全部留在北京成为日后使团图

书馆的馆藏内容。在使团设立图书馆之前, 使团成员的个人藏书大都在他们归国时带回俄国, 形成了目前俄罗斯各地各类图书馆中文善本的重要来源。如1821年回国的第九届使团团长比丘林(Н.Я.Бичурин)“带回了12箱汉文和满文书籍: 5部汉语字典, 2部满语字典, 中国历史著作(43册, 2箱), 汉文和满文的满族历史, 四书, 十三经, 清、辽、元历史方面的书籍”⁶。1830年回国的第十届使团团长加姆斯基也“将大量中文和满文书籍运往俄国, 其中有一百多本都送给了伊尔库茨克的学校, 在彼得堡公共图书馆、莫斯科大学图书馆、彼得堡神学院图书馆和亚洲司都有加姆斯基购回的图书”⁷。由喀山大学派出随第十二届东正教使团入华(1840年到达北京)的瓦西里耶夫回国时也带回不少中国书籍。⁸ 瓦西里耶夫在彼得堡大学东方系编写的讲义《中国文献史资料》⁹中介绍中国典籍, 并展现他为自己的562种藏书所编的书目, 其中“史部”第一种便

1 柳若梅等著,《沟通中俄文化的桥梁——俄罗斯汉学史上的院士汉学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第17页。

2 布塞(Johann Heinrich Busse, 1763—1835),德国人,1794年起被聘为彼得堡科学院副教授,1800年起为荣誉院士。1797—1799年间担任彼得堡科学院图书馆馆长。

3 斯卡奇科夫著、柳若梅译:《俄罗斯汉学史》中译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81页。

4 Китайск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 и ученые труды членов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й миссии в г. Пекине..., СПб., 1889. Стр.8.

5 同上,第11页。

6 《俄罗斯汉学史》中译本第130页。

7 同上,第185页。

8 前引书中提到,“在北京时期瓦西里耶夫就开始了解中国典籍,那时他在完成喀山大学交给他收集书籍的任务。对这项任务他十分尽心,买到的每一本书都仔细研究,最终带回了汉语、满语、藏语和蒙语书籍849种,共计2737册”。见《俄罗斯汉学史》中译本第320页。

9 Материалы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Лекции, читанные заслуженным профессором С.-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ата. В.П.Васильевым. Лит. Иконникова, П. Рыбацк. ул. Д.№8. Съ разрешением проф. Васильева скрепилъ В.Ловяшинъ. 该书为石印本。

是《史记》，为司马迁《史记》与裴驷的《史记集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的合订本¹，遗憾的是，书中对其《史记》并未有详细著录信息。2012年，圣彼得堡大学孔子学院资助出版的瓦西里耶夫中文藏书目录²中，与《史记》相关的书籍有两种——《史记菁华录》和《史记》。《史记菁华录》³为清代钱塘人姚祖恩从篇幅长达57万字的《史记》中抽挹精华，选取约10万字篇幅并加以点评，是《史记》选评本中的优秀之作，自康熙六十年（1721）梓行以来，常被作为学史的入门书籍，后又作教材使用。1897年成立的上海商务印书馆创办之初以教科书出版为其主业，特别是史学教科书，《史记菁华》应在此列。该书目中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图书馆所藏《史记菁华录》⁴，未必曾是瓦西里耶夫的私人藏书。因为瓦氏最后一次来华是在1890年前往伊犁。现



在这部书目中所著录的《史记菁华录》，既然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的石印本，应该刊印时间不会早于1897年，因而不是瓦西里耶夫1840—1850年间随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驻扎北京期间所得。瓦西里耶夫回国后先后在喀山大学和彼得堡大学主持汉语和满语教学，1890年为看望在维尔内（今阿拉木图）的女儿而顺路前往伊犁，未见期间有

购书记录。1900年瓦氏去世。因而这部1897年之后刊印的、常用作教材的《史记菁华录》应该是后来专门为彼得堡大学东方系的教学而购，或来自自由中国返回俄国的外交人员，如1902年由俄驻华公使回国后进入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执教的波波夫等。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图书馆收藏王西里院士中国书籍目录中的《史记》⁵，附牌记图

1 见前引书第24页。

2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孔子学院，叶可嘉、马懿德，《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图书馆收藏王西里院士中国书籍目录》，Институт Конфуция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Завидовская Е.А., Маяцкий Д.И., Описание собрания китайских книг академика В.П.Васильева в фондах Восточного отдела научной библиотек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2012.

3 前引书第402页，ВУ 264，史记菁华录，索书号 ВУ 264，封面、版心书口题：史记菁华录。出版年代不详。上海商务印书馆。石印本。1函（加8份副本），3册，6卷。46+42+48叶。书的面积：202×132 CM。版框：158×118 CM。半页7行，行8字。有双行注释。单黑鱼尾，线装。书保存得很好，是修补的，每函加欧式封面。内容：1册：康熙辛丑年题辞（1721年）；目录，卷1—2；2册：卷3—4；3册：卷5—6。

4 1855年，沙皇俄国将当时俄国与东方学相关的各院校力量集中于彼得堡，创办了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喀山大学的所有教授、教师、部分大学生、图书及古钱币研究室的一部分迁往彼得堡。此后，彼得堡大学成为俄国东方学人才的培养基地，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至1899年海参崴又成立东方语言学院）培养沙俄中国事务所需的几乎所有人才。见《俄罗斯汉学史》中译本第291—348页。

5 叶可嘉、马懿德：《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图书馆收藏王西里院士中国书籍目录》，圣彼得堡，2012年。Завидовская Е.А., Маяцкий Д.И. Описание собрания китайских книг Академика В.П. Васильева в фондах Восточного отдела научной библиотек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2012. 第410页，ВУ 268，史记，索书号 ВУ 268。扉页、版心书口题：史记。出版年代不详。上海扫叶山房石印。石印本，6函，22册，130卷。册约120页。副本数：函一有8份副本；函二有9份副本；函四有8份副本；函五有4份副本。书的面积：259×187CM。版框：188×13CM。半叶11行，笱22字。有双行注释。单象鼻，双黑鱼尾，线装。书保存得很好，被修补，每函加欧式封面。内容。函一，司马贞史记索隐序；司马贞史记索隐后序；裴驷史记集解序；张守节史记正义序，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张守节史记正义；史记目录；史记1—12。函六。史记106—130。

片，言“同治五年首夏金陵书局校刊九年仲春毕工”，说明该书为清代校刊的金陵书局本（即“局本《史记》”）《史记》。局本《史记》是唐仁寿、张文虎校勘《史记集解索隐正义》的合刻本，共一百三十卷，同治五年开始刊刻，历时四年，于同治九年完成，是明清《史记》刻本中的一流善本。¹《目录》中称该书为“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扫叶山房”明代后期洞庭席家弟子与人合伙初创于松江、苏州，取古人“校书如扫落叶”之意命名，在康熙及乾嘉年间经历了几代辉煌，至咸丰年间，清兵与太平军在苏松一带激战，殃及席氏书坊在战乱中损失颇大。迫于形势，扫叶山房迁于上海，先在县城设立分号，此为后来的上海扫叶山房南号，光绪年间 1888 年又在棋盘街设立北号。扫叶山房在中国印刷史上较早采用石印技术，光绪年间以后，其石印本开始流传坊间。²扫叶山房存在的时间与瓦西里耶夫在华时间地点不符，故该书也非来自瓦西里耶夫早年的个

目前斯卡奇科夫藏书的中文写本和刻本分藏于俄罗斯国家图书馆（莫斯科）手稿部和东方部。其中写本约 900 种，包括司马迁《史记》之《天官书》。

人藏书，应属后进入彼得堡大学图书馆的藏书。扫叶山房石印书籍在俄罗斯收藏完整，1912 年阿列克谢耶夫进入亚洲博物馆工作以后，通过在外交官和俄国东正教使团人员与扫叶山房、二酉堂等印书楼建立了联系，购买了两家印书楼刊印的全部图书。³亚洲博物馆的图书后来构成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图书馆。

1974 年，苏联科学院“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总编室出版了《斯卡奇科夫中文写本和地图目录》⁴，收入斯卡奇科夫相关收藏 333 种。斯卡奇科

夫（中文名“孔气”、“孔琪”、“孔琪庭”）是第十三届东正教使团（1850 年到达北京）随团学生，1860 年使团期满回国后又继续担任俄国驻中国塔城领事，1867—1879 年间又相继担任俄国驻天津领事和俄国驻华各开放港口的领事，在华生活时间较长。斯卡奇科夫在中国期间，“曾利用一切机会买书，我仔细检视了伦敦、巴黎、柏林、维也纳各图书馆、彼得堡亚洲博物馆及公共图书馆内的汉文藏书后，给自己制定了一个方针，即在中国主要只购买上述各馆所没有的善本书籍”⁵。目前斯卡奇科夫藏书的中文写本和刻本分藏于俄罗斯国家图书馆（莫斯科）手稿部和东方部。其中写本约 900 种，包括司马迁《史记》之《天官书》。⁶该书应是斯卡奇科夫 1848—1859 年间在北京生活期间收藏，是他了解和研究中国天文学的重要资料之一。在这段时间里，适逢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筹建天文观测站。曾受过天文学教育的斯卡奇科夫受命筹建和管理使团天文

1 该本的特点是不主一本、择善而从。在《史记》原本方面，以明末毛氏汲古阁《史记集解》一百三十卷为底本，参校了钱泰古、汪远孙、吴春照所校宋刊残卷，另参以明代王延吉本、游明本、柯维熊本、凌稚隆评林本及清代武英殿本等，考证各本之异同，择善而从。对于三家注文，同样不主一本。《集解》用毛氏汲古阁本，《索隐》用毛氏汲古阁覆北宋大字本的《索隐》单行本，《正义》用明刻前参以明柯本、凌林、清殿本。汇而校之。见董焱的《清代〈史记〉的研究成就》，载《社会科学论坛》2007 年第 4 期（下）第 176 页。

2 关于扫叶山房，见马学强：《江南席家与扫叶山房》，载《史林》2009 年第 6 期，第 10—22 页。

3 Азиатский музей—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АН СССР.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Главная редакция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 1972. Стр.86.

4 А.И.Мелналкнис, Описание китайских рукописных книг и карт из собрания К.А.Скачкова. Главная редакция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 1974. 该书中译本为：【俄】麦尔纳尔克金斯著，张芳译、王菡注释、李福清审订，《康·安·斯卡奇科夫所藏汉籍写本和地图题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 年。

5 前引书第 9 页。

6 № 206(667) 评林会星辰传 (Пин линь хуй сн чэнь чжуань) Описание небесных тел с комментариями. Раздел 天官书 Тянь Гуань шу из 史记 «Ши цзи» со сводными комментариями. А.И.Мелналкнис, Описание китайских рукописных книг и карт из собрания К.А.Скачкова. М., 1974. стр.142. 中译本见前引书第 134 页：№ 206 (667) 评林会星辰传。《史记》天官书部，集注。

观象台¹，坚持每日进行天文观测。斯卡奇科夫“研究过《五礼通考》，编制过星宿名录，附有译名并指出其在天河系中的位置”²。斯氏后来于1874年在彼得堡《国民教育部杂志》上发表的《中国天文学的命运》³一文应是在北京长期生活期间主持天文观测站工作所得。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成员从北京带回俄国的中文和满文书籍，其中受委托订购的书籍大都藏于彼得堡科学院、大学图书馆，使团成员在京的个人藏书则在回国后卖给了俄国一些机构。因此，这些藏书去向不一，目前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圣彼得堡）、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图书馆是两处主要的收藏地点。

在圣彼得堡俄罗斯国家图书馆中文写本和善本书目⁴中，据1941年登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成员从北京带回俄国的中文和满文书籍，其中受委托订购的书籍大都藏于彼得堡科学院、大学图书馆，使团成员在京的个人藏书则在回国后卖给了俄国一些机构。

册记载，该馆藏有《史记》⁵一函，共8册，为第1—17卷，来源于彼得堡科学院院士布罗塞⁶的收藏。著录内容为：“刻本，非全本，存1函，8册（1—17卷），原为130卷。作者司马迁（公元前145—85年），注释者裴驷（宋）、司马贞、张守节（唐）。刊印者为陈子龙（字卧子）和徐孚远（字闇公），素

位堂板。附两刊印者所做的序，第一篇序言的时间为崇祯庚辰年（即崇祯十三年）（1640年）。函套及第一册封面上盖印‘元’和‘文锦堂藏书’。目录中明确著录其《史记》非全本，只存一函8册17卷，该书其余卷册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图书馆。”⁷据此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1973年出版的中文善本书目⁸中查找，其中《史记》⁹刻本与圣彼得堡国家图书馆藏《史记》可以相呼应。两相对比，圣彼得堡国家图书馆藏《史记》只存包含1—17卷的第一函计8册，而此处存3函24册计113卷，非全本是由于缺少第1—17卷。两者均明确著录为含《史记》三家注并徐孚远、陈子龙《史记测议》本。由是观之两者合二为一可成一套完整《史记》百三十卷全本。但两者间也存在矛盾

1 《俄罗斯汉学史》中译本第220页。

2 李福清（Б.Л. Рифтин）：《与众不同的俄罗斯汉学研究及收藏家斯卡奇科夫》，《康·安·斯卡奇科夫所藏汉籍写本和地图题录》中译本第3页。

3 Судьба астрономии Китая. — «Журнал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народного просвещения», 1874, 5, с. 1—31. (Отд. отд. — СПб., тип. В. В. Балашева. [б. г.], 31 с.)

4 Российская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 *Китай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и ксилографы Публичной библиотеки.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ий каталог*.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993.

5 史记 Записки историка. Ксил. Неполный экз. В наличии 1 тао, 8 б., содержащие 1—17 цз. (из 130-ти). 15,5×24,5; 14,5×19,6. Авт. Сыма Цянь 司马迁 /145-85 до н.э., коммент. Пэй Инь 裴驷 (династия Сун), Сыма Чжэнь 司马贞, Чжан Шоуцзу 张守节 (династия Тан). Издатели Чэнь Цылуи 陈子龙. 2-е имя Воцзы 卧子, Сюй Фуюань 徐孚远, 2-е имя Аньгун 闇公. Выгравировано 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е Сувэй-тан 素位堂. Предисл. обоих издателей. Первое предисл. датировано годом Чун-чжэнь гэн-чэнь (1640). На тао и обл. Б. 1 нумерующий штамп 元 первый (из первых) и штамп 2,2×2,2 с текстом: 文锦堂藏书 Книга хранящаяся в изд-ве Вэньцзинь-тан.—Российская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 *Китай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и ксилографы Публичной библиотеки.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ий каталог*.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993. Стр. 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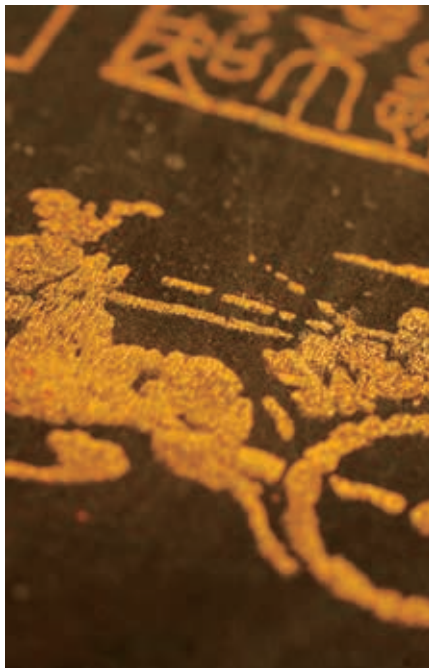
6 布罗塞 (Marie-Félicité Brosset, 1802—1880), 彼得堡科学院法裔院士, 东方学家, 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研究专家。

7 Российская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 *Китай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и ксилографы Публичной библиотеки.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ий каталог*.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993. Стр. 46.

8 Б.Б. Вахтин, И.С.Гуревич Ю.Л.Кроль, Э.С.Стулова, А.А. Торопов, Каталог фонда китайских ксилографов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АН СССР, Т. 1. М.: Главная редакция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73. стр. 177.

9 前引书第177—178页。史记, [同人堂梓行, 1806年新铸]。司马迁著, 裴驷集解, 司马贞索隐, 张守节正义, 徐孚远、陈子龙测议。ШИ ЦЗИ. Сыма Цянь—авт., Пэй Инь, Сыма Чжэнь, Чжан Шоу-цзе—комм. Сюй Фу-юань, Сэнь Цзы-луи—комм. 3 т., 24 б., 113 цз. Деф.: некомпл. (нет цз. 1-17). 24,2×15,8, 19,9×13,6, 9 и 18/20. (此处俄文内容为:《史记》,司马迁著,裴驷、司马贞、张守节注释,徐孚远、陈子龙注释。三函二十四册百十三卷。缺点:不全,缺一至十七卷。开本为24.2×15.8, 19.9×13.6, 9和18/20.)

之处，圣彼得堡国家图书馆藏《史记》明确著录为“素位堂”刻本，且第一函和第一册的封面都盖有“文锦堂藏书”的印章；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图书馆藏本却著录为“同人堂梓行，1806年新铸”；此外，两处藏本开本略有差异。此相合与相异之处需待比对原本方能辨析明了。“素位堂”和“同人堂”均为明清时期中国刻书重镇苏州的刻书坊家。而关于“文锦堂”，在李文藻的《琉璃厂书肆记》中提到，“文锦堂”是乾隆年间北京琉璃厂三十家书肆之一。在1864年俄国驻华公使馆设立之前，在华俄人除商人外，大都以北京为主要居留地点。因此，布罗塞收藏的《史记》应为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相关人员为其在北京购得。国内出版的古籍善本书目中，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上》¹中著录有《史记》三家注与徐孚远、陈子龙《史记测议》合刻本有3种：一种只标明“明崇祯刻本”；一种同为明崇祯刻本，附有清吴熙载跋；一种为“明末素位堂刻本、清朱骏声批校”。《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²中与俄藏《史记》版本



接近的也是这3种。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图书馆，另藏有两种《史记》残本。其一为前述藏本的副本，但只有18册120卷，缺47—57卷。其二为《史记》三家注本，只存1函8册58卷，缺47—104卷。除《史记》外，该馆还藏有广雅书局1887年版的梁玉绳《史记志疑》³全本（计24册36卷）和民国版（1924年）崔适的《史记探源》⁴。

二、《史记》在俄罗斯的翻译

（一）俄译《史记》的历史

俄国关于《史记》的最早翻译见于18世纪。18世纪初叶，俄皇彼得一世为引俄入欧而在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推行大规模改革，改革的推进需要一大批视野开阔、头脑深刻、知识丰富的人才。为此，俄罗斯国家在国内大举兴办教育的同时将大量贵族子弟派往国外学习，成就了一批有益于国家发展的有识之士。他们回国后，利用国内俄国报刊出版的繁荣⁵，大规模地向俄国民众传播欧洲的先进技术和思想文化，并由此拉开了俄国启蒙运动的序幕。此后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下的18世纪后半叶，欧洲启蒙思想在俄国大行其道，以法国为中心的中国105热甚至也随之被裹挟入俄，回应着俄国因独享俄中陆路贸易在国际市场上为俄国带来高额利润而引起的俄国对中国日益浓厚的兴趣。正是在这股来自于欧洲中国热的风潮中，司马迁的生平与著作被介绍给了俄国知识界，见于俄国著名知识分子、宫廷翻译家

1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8页。

2 翁连溪编校：《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线装书目，2005年，页二一一。

3 Каталог фонда китайских ксилографов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АН СССР, Т. 1. Стр.179. 史记志疑, [б. м.], 广雅书局刻[史学丛书本], 1887. 梁玉绳撰:ШИ ЦЗИ ЧЖИ И. Лян Юй-шэн — авт. 24 б., 36 цз. 29,4×17,7; 21,3×14,5; 11/23.

4 Каталог фонда китайских ксилографов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АН СССР, Т. 1. Стр.178. 史记探源, 北京, 大学出版部, 1924. 崔适著:ШИ ЦЗИ ТАНЬ ЮАНЬ. Цуй Ци—авт. 2 б., 8цз. 22,5×13,7; 16,5×10,5; 13/33.

5 彼得一世统治时期，1703年俄国拥有了第一份官方正式出版的报纸《公报》（Ведомости）（1727年更名为《彼得堡公报》）（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1728年出版了俄国第一本杂志《历史、物种起源、地理月报》（Месячны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генеалогические и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примечания в Ведомостях）（1728—1742年间发行）。在18世纪的百年间，俄国书刊出版自由，直至1794年大革命爆发开始实行书刊审查制度。18世纪启蒙时期的俄国共出版各类期刊约200多种。

维廖夫金¹于1786—1788年间在彼得堡摘译出版的法国耶稣会士钱德明²的15卷本《关于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风俗、道德、习惯之记录》³。俄译本为六卷本。⁴第一卷为中国历史,第二卷为《大学》和《中庸》的译本,第三卷为历史年表,第四卷为论埃及人与中国人、蚕、棉花植物,第五卷为中国的重要人物,第六卷为伟人、植物。在第五卷中介绍了司马迁的生平以及《史记》一书。在华早期耶稣会士百余年深入研究中国史籍的认识⁵,极大地丰富了俄国关于中国的知识。

自1715年入京的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被称为“俄罗斯汉学家的摇篮”,



是俄国关于中国知识的主要来源。俄国与中国西北部和北部相邻,在俄国认识中国的过程中,俄罗斯人首先关注的是与之打交道的满清的现状和历史,并由此推衍至满族与中国北部和西北部各民族的关系、中国北部和西

北部各民族历史等。19世纪之前的俄国,汉学处于酝酿的萌芽阶段。1807年入华的俄国东正教第九届使团团长江丘林在华近十四年,被后世誉为“俄罗斯汉学的奠基人”。比丘林在北京期间勤奋阅读翻译中国典籍,《史记》、《御

- 1 米哈依尔·伊万诺维奇·维廖夫金(М.И.Веревкин, 1732—1795), 18世纪俄国知识界的重要人物,翻译家、文学家。曾为莫斯科大学、喀山中学等教育机构的负责人,1763年起受女皇委托专门翻译西欧书籍。1790年维廖夫金在彼得堡翻译出版了钱德明的《孔子传》(原为《关于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风俗、道德、习惯之记录》之第十二卷)。
- 2 钱德明(Jean-Joseph-Marie Amiot, 1718—1793),法国耶稣会士,1750年入华,1751年抵北京,在北京期间经历了1773年的罗马耶稣会解散,被称为是耶稣会最后一位在华传教士。详细信息可见:【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下》,中华书局,1995年,第873—905页;康志杰,《最后的耶稣会士——钱德明》,载《世界宗教文化》2002年第3期,第20—21页。
- 3 【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下》,第880页中有如下记载:德明所遗之撰述,业经其忠诚明智之友人伯尔坦、比尼翁、鲁西埃暨《关于中国之记录》之刊行人巴特(Battrux)、布雷克吉尼(de Breequigny)等在法国刊布。其标题为《关于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风俗、道德、习惯之记录》,北京诸传教师合撰。一五卷,四开本,一七七六至一七八九年间巴黎出版。[第十六卷由萨西(Sylvestre de Sacy)于一八一四年刊行,在巴黎和斯特拉斯堡两城出版。]……一八一五年刊《百科杂志》评是书云:“任何国家之记录,无如是编之可宝贵,凡不偏不党,具有见识之人,所欲得之一切重要参考资料,皆备载焉。是为吾国教士传布信仰,发扬科学热心之成绩”。
- 4 М. Веревкин (пер.). Записки, надлежащие до истории, наук, художеств, нравов, обчаев и проч. Китайцев, соиненные проповедниками веры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в Пекине. Изданы в Париже с воли и одобрения короля в 1776 г., на российский же язык переложены в 1785 г., губернии Московской, Клинской округи, в сельце Михалева. Т. 1-6. М., униве. Тип. У Н.Новикова, 1786—1788.Т.1, 1786, 5+364 с. (История). Т.2, 1786, 267+10 с. Прил. + (1) с. («Буквы китайцев: Та-гио, Тшон-ушиг», т. е. «Дасюэ» и «Чжуньюн»). Т.3, 1786, 318 с. («Древности китайцев, доказанные памятниками. Объяснение рисунков и таблиц»). Т.4, 1787, 345 с. («Розыски об египтянах и китайцах, шелковичные черви, хлопчатобмажные растения»). Т.5, 1788, 3+272 с. («Великие мужи народа Китайского») Т.6, 1788, 252 с., 1 портр. («Великие мужи, растения и кусты».)
- 5 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的译书活动中出版了不少欧洲关于中国的书籍,如1774—1777年出版了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及其所属鞑靼地区的地理、历史、编年纪、政治和博物》(Дюгальд Ж.Б.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хронологическ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и физическое описание китайския империи и Татарии китайские, снабденное разными чертежами и разными французского перевденное Игнатъев де Теильсом. СПб. Ч.1, 1774; ч.2, 1777.)、1780年摘译出版了柏应理的《中国哲学家孔子》(Описание жизни Конфуция, китайских философов начальника. Пер. с лат. М.)、1788年由法文俄译出版了比利时耶稣会士鲁日满的五卷本《鞑靼中国史》(История о завоевании Китая маньчжурскими татарами, состоящая в 5 книгах, сочиненная г. Воже де Брюном В.ет Р. D. М., перевел с французского А.Р.)、等多种。详见 О.Л.Фишман, Китай в Европе: миф и реальность. М., стр.390—391.

批通鉴纲目》、《前汉书》、《后汉书》、《金史》、《魏史》、《北史》、《隋史》、《全唐书》等都在他涉猎的范围之内。¹回国后以在京积累的资料为基础展开学术研究，5次获得当时俄国奖励人文科学的最高奖杰米多夫奖。在1851年出版的三卷本的《古代中亚各民族资料》²中的第二卷中翻译使用了司马迁《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和卷一二三“大宛列传”。该书中比丘林向俄国介绍中国这个俄人知之甚少的国家：中国古代和中世纪的历史说明，中国与其相邻和相距较远的东南亚和中亚各民族之间曾有着密切的联系，一度推行扩张政策。在此比丘林还运用《资治通鉴纲目》和《史记》中相关资料展开论述。

苏联时期，俄译《史记》一直是1930年成立的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工作计划内容。在科学院院士阿列克谢耶夫负责的中国室，中国史研究便是从翻译《史记》开始。1934年阿列克谢耶夫带领其弟子舒茨基、瓦西里耶夫、杜曼、彼得罗夫、戈尔巴

该书中比丘林向俄国介绍中国这个俄人知之甚少的国家：中国古代和中世纪的历史说明，中国与其相邻和相距较远的东南亚和中亚各民族之间曾有着密切的联系，一度推行扩张政策。

乔娃、西蒙诺夫斯卡娅组成《史记》翻译小组，但政治波折和战争使翻译计划未能落实，只留下了阿列克谢耶夫翻译的散篇手稿。二战爆发后，东方学研究所被疏散。1943年主持汉蒙研究所工作的阿列克谢耶夫和龙果夫共同为研究所制定的汉学研究工作计

者年表、孔子世家、外戚世家、萧相国世家、伯夷列传、管婴列传、平原君虞卿列传、范雎蔡泽列传、屈原贾生列传·屈原、酷吏列传、游侠列传、滑稽列传、货殖列传、太史公自序。

阿列克谢耶夫俄译《史记》的计划虽然未能实现，但营造了苏联汉学界研究中国历史的氛围和学术基础。在中国历史研究中，注重不同时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性质，研究在漫长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变迁，并由此关注不同时期的农民起义和变法运动，逐渐形成了苏联汉学史上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研究陈胜吴广起义的汉学家佩列洛莫夫，³在完成关于陈胜吴广起义的学位论文后，于1958年翻译发表了《史记·陈涉世家》。⁴

二战之后，特别是1949年起，汉学研究在苏联东方学领域的位置更加重要，迎来了关于中国文学作品俄译的高潮。1956年，翻译家帕纳秀克翻译出版了节译本《史记》⁵，包括“列传”部分之十七种：管晏列传、老

- 1 Л.И.Думан, О труде Н.Я.Бичурина «Собрание сведений о народах, обитавших 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в древние времена», И.Я.Бичурни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рус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М., 1977. Ч.2, стр.21.
- 2 Н.Я. Бичурин, Собрание сведений о народах, обитавших 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в древние времена. В трех частях, с картой на трех больших листах. Сочинение монаха Иакинфа, удостоенное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Академией наук Демидовской премии. – СПб., тип. Военно-учеб. Зав., 1851, ч. I, XXXIV+III+VII+484 с.; ч. II, IV+179 с.; ч. III, VI+273с., геогра. Указатель мест на карте к истории древних среднеазиатских народов, 116+VIII. 当代的俄罗斯汉学家为该书重新撰写序言并做注释，于1950–1953年间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推出再版的三卷本：Собрание сведений о народах, обитавших 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в древние времена. Ред. Текста, вступ. Статьи, комментарий. А.Н.Бернштам и Н.В.Кюнера, т. I-III. – М. – Л., изд. АН СССР, 1950-1953. (ин-т этнографии им. Н.Н. Миклухо-Маклая).
- 3 稽辽拉 (Л.С.Переломов, 1928--), 中国革命家稽直之子，历史学博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俄罗斯儒学基金会主席。研究方向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先秦诸子百家思想、儒家思想。
- 4 Сыма Цянь о Чэнь Шэне, пер., вступ. ст. И коммент. Л.С.Переломова. – «Советское Китаеведение», 1958, №4, с.192—205.
- 5 Сыма Цянь. Избранное. Пер. с кит. М., Гослитиздат. 359 с.

子韩非列传、司马穰苴列传、孙子吴起列传、伍子胥列传、苏秦列传、张仪列传、乐毅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屈原贾生列传、吕不韦列传、刺客列传、李斯列传、黥布列传、淮阴侯列传、韩信卢绾列传、司马相如列传。

也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副所长越特金酝酿全文俄译并注释《史记》。1957年，在德国马堡召开的第十届青年汉学家国际研讨会上，越特金就司马迁在史学史上的作用问题发言的同时，公布了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即将全译《史记》的计划。¹在原本选用上，越特金选用了最早的《史记》三家注合刻本——黄善夫本，并结合1959年中华书局以金陵局本为底本的顾颉刚注《史记》为蓝本进行翻译。翻译过程中译者与中国史学界保持密切的学术沟通，与顾颉刚等中国学者通信，并利用访学中国的机会与中国学者交流，同时把中国史学研究状况介绍给苏联同行。与欧美学者的通信也开阔了越特金的视野，如美国汉学家顾立雅、费正清、拉铁摩尔、卜德、倪豪士，英国汉学家特维切特里耶维，德国汉学家弗兰格，捷克汉学家波柯拉等。在中国学研究所，越特金与本所古文功底过硬的同事塔斯金合作，²于1972年推出新版俄译注释本《史记》的第一卷（含《史记》卷一至四，即《五

俄罗斯翻译《史记》的百余年历程折射了俄国学术文化和俄罗斯汉学的发展历程，同时也反映了俄罗斯标准语的变迁，反映了俄罗斯汉学家和史学界对“翻译”理解的变迁。

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和《周本纪》），1975年推出第二卷（含《史记》卷五至十二，即《秦本纪》、《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吕太后本纪》、《孝文本纪》、《孝景本纪》、《孝武本纪》）。此后越特金独立翻译《史记》其他部分的内容。在1995年去世前，越特金出版了《史记》俄译注释本至第六卷（至此共俄译出版《史记》至卷六十）。越特金去世后，其后人在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汉语教研室主任高辟天的帮助下，先后于1996年和2002年推出了《史记》俄译注释本的第七卷和第八卷，《史记》前110篇俄译得以问世。2010年越特金诞辰百年之际，俄译注释本《史记》第九卷问世，从而宣告世界上第一个欧洲语言全译注释本《史记》诞生。在俄译注释本《史记》推出的过程中，俄罗斯学者一直保持精益求精的学术态度，

2001年，俄罗斯《史记》研究的重要学者——莫斯科大学的高辟天、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的克罗尔和尼基季娜修订第一卷和第二卷《史记》俄译注释本，于2001年和2003年出版了越特金和塔斯金合作翻译的《史记》俄文译注本前两卷的修订版，修订内容包括《史记》俄文译注本的前十二篇。

（二）不同时期俄译《史记》的特点

俄罗斯翻译《史记》的百余年历程折射了俄国学术文化和俄罗斯汉学的发展历程，同时也反映了俄罗斯标准语的变迁，反映了俄罗斯汉学家和史学界对“翻译”理解的变迁。

18世纪下半叶是俄罗斯民族文化发展成长的突变期，出现了钱德明关于司马迁及其《史记》介绍的俄译，《史记》在丰富俄国关于外部世界的国家、民族、伟人的知识的同时，为俄国自身的文化发展提供了参照。

19世纪30年代起，比丘林出版的关于中国的大量书籍，为俄国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中国提供了依据。比丘林著作中大量关于中国的信息虽按当时的学术规范较少注明出处，但仔细比对可以明确地查索到其渊源。由于“匈奴列传”、“大宛列传”在比丘林著作作为介绍中国边疆民族被转述借用，

1 В.Н.Никифоров, Заметки о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молодых китаеведов. — «Советское китаеведение», 1958, №1, с.231.

2 塔斯金(Таскин Всеволод Сергеевич, 1917—1995), 生于赤塔州, 1936年毕业于哈尔滨东方学院法律系东方经济专业, 1957—1961年间在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工作, 1961年后在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工作, 主要研究方向为契丹史、中国北部少数民族史。

因而这里的翻译与当今的逐字逐句翻译差别很大。另外，在阿列克谢耶夫看来，“比丘林的翻译常常比较随意、不准确、存在漏译，使用的是半教会斯拉夫语的风格”¹。这是当代苏联学者比较认可的一种看法。苏联汉学家杜曼有如下较为典型的对比：公卿皆曰：单于新破月氏，乘胜不可击。

比丘林译为：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чины были того мнения, что с торжествующим неприятелем, недавно побудившим юучжи, трудно воевать.

塔斯金译为：Все сановники сказали: Шаньюй только что разгромил юучжи, нельзя (сейчас) нападать на одержавшего победу.

两种译本的不同既反映了对原文理解的差异，也反映了不同时期俄语语言面貌的差异。

苏联 20 世纪汉学领袖阿列克谢耶夫对于俄译中国典籍有着独到的见解。首先在原本的选取上，早期欧洲传教士入华使得不少中国思想文化典籍的欧洲语言译本较早地传入欧洲，也推动了现代欧洲汉学对中国文化典籍的接受和再译。由于俄语与欧洲语言在语言特点上的亲属关系，因而对于俄罗斯学者来说，阅读欧洲语言文本相比于阅读中文原本，难度大大降低。不过，阿列克谢耶夫认为，尽管很多中国典籍都存在欧洲语言译本，但为了准确向俄罗斯介绍中国文化，俄译



中国典籍应从中文原本直接翻译，而不是从欧洲语言译本间接翻译。翻译时不能漏译，同时又必须克服逐字逐句“死译”弊端。在准确理解中文典籍的前提下，选用与原文相配的语言风格和表达手段，在综合理解的同时运用流畅的语言进行俄文翻译。下面是阿列克谢耶夫翻译的《滑稽列传》中的语句：

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太史公曰：天道恢恢，岂不大哉！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

Конфуций говорит: «Шесть знаний для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ого дела — одно. “Устав поведения ученых” — он создан, чтоб дать распорядок людям. “Канон музыкальный и древний” — он создан, чтоб вызвать гармонию в жизнь

их. “Писанья античных времен” — они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дать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в делах. “Кантаты, стихи и гимны” — они созданы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мыслям дать жизнь. “Канон мировых пермен” — он создан, чтоб дать изменение жизни в богов. “Канон Весен-осеней” создан, чтоб нам говорить о чести нашей и долге. Граф величайший астролог тут скажет так: «Путь Неба велик и велик, и разве же он не громаден? В простых разговорах, в совсем незначительных фразах ведь встретиться может такое, что разрешит и сложную задачу.

这一段译文中可以看出阿列克谢耶夫翻译时特别注意翻译语言的工整，“子曰”中的 6 个句式工整的语句，译文中也以结构相同的语句相对，头两句都使用了...создан, чтоб...的结构，第三句起考虑到了俄语语句风格不致于单调，自“《诗》以达意”起，在结构上略有调整，使用了...для того, чтоб..., 两句之后再次使用...создан, чтоб...与前两句相呼应。而“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一句，阿列克谢耶夫理解为“在简单、不经意的语句中也会遇到能够解决复杂问题的内容”：В простых разговорах, в совсем незначительных фразах ведь встретиться может такое, что разрешит сложную задачу. 俄文处理得灵活流畅而不失准确。

1 Шедевры китайской классической прозы в переводах академика В. М. Алексева: в 2 кн. М., 2006. Стр. 152.

阿列克谢耶夫译本中，“太史公”都被译为“Графвеличайшийастролог”，体现了译者力求准确扣紧原文的翻译态度。

阿列克谢耶夫与《史记》的不解之缘与苏联时期的汉学发展史密切相关，因苏联的政治风暴而归于悲剧命运。起因是阿列克谢耶夫1916年应邀在法兰西学院和吉美博物馆举办的六次关于中国文学的讲座于1937年在巴黎被结集出版。¹此时正值苏联大清洗运动进行得最为严酷之时，法国出书一事被解读为背叛苏维埃国家，阿列克谢耶夫被禁止从事字典和语法研究之外的其他任何问题的研究。阿列克谢耶夫追随先师沙畹展开《史记》的学术翻译，现存并出版的阿列克谢耶夫《史记》译稿只相当于阿列克谢耶夫准备组织《史记》翻译的译前案头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文艺学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文学理论界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论争及其后关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学思想的确立，都与苏联文论形成了直接的交流与回应。中国文学就是



随着这样的直接交流的洪流而进入俄人视野。继1954年《三国演义》俄译本问世后，大量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被俄译出版。一批翻译家脱颖而出，阿列克谢耶夫和帕纳秀克俄译的《史记·列传》也随之出版。阿列克谢耶夫和帕纳秀克²的译本着意于作为中国纪传体文学的开端的《史记》，翻译风格上也属于不做史学注释的文学翻译：面向一般读者，注重再现作品的艺术价值，不拘泥于原文的文字，进行了适当的改编。

1960年，苏联科学院院士康拉德³建议越特金在《史记》的翻译中应注重司马迁对于历史进程的理解，注重司马迁在描述历史现象时流露出的创造性见解，关注司马迁的史观。康拉德认为，尽管西方史学史上，塔希陀、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古典史家构成了西方史学的基础，司马迁的《史记》可以丰富古典史学的内涵，并可能随着《史记》的翻译而形成具有世界意义的古典史学观⁴。越特金完全接受这一见解，在俄译《史记》时做详细注释，为俄语读者再现作者司马迁所处的历史语境，形成与法国汉学家沙畹翻译《史记》的方式相一致的服务于研究的学术翻译。翻译手法严谨、细致，试比较《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屈原”部分的越特金译本和阿列克谢耶夫译本：

标题：

中文：《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

阿译本：Отдельное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е о Цюй Юане⁵

越译本：Цюй Юань, Цзя-шэн ле чжуань—Жизнеописание Цюй Юаня и Учителя Цзя⁶

1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Six conférences au Collège de France et au Musée Guimet (Novembre 1926) par Basile Alexéiev. – Fnnales du Musée Guimet. Bibliothèque de Vulgarisation., 1937, t.52.

2 帕纳秀克(В.А.Панасюк, 1924—1990)，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苏联著名翻译家，除摘译出版了《史记》外，《三国志演义》、《红楼梦》、《说岳全传》、《三侠五义传》、《平妖传》等俄译本都出自其笔下。

3 康拉德(Н.И.Конрад, 1891—1970)，语文学博士，苏联科学院院士，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史、古代汉语、日本语言、文学和历史。

4 Н.И.Конрад. Неопубликованные работы, письма. М., 1996, с.5. 转引自 Россий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Институт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越特金列传 Юэ-Тэ-цзинь ле чжуань, Судьба востоковеда Р.В.Вяткина. М., 1998. Стр.50-51.

5 Шедевры китайской классической прозы в переводах академика В.М.Алексеева: в 2 кн. М., 2006. Т.1, стр. 131.

6 Сыма Цянь Ши цз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записки). Избранное. Т.И. Перевод и комментарий Р.В.Вяткина. М., 2006. Стр. 186.

正文第一段：

屈原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阿译本：Цюй Юань—ему имя было Пин. Он был сородичем

Чуского дома, служил у Чуского князя Хуая приближенным «левым докладчиком». Обладал обширной наслышанностью и начитанностью, память у него была мощная. Он ясно разбирался в вопросах, касающихс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благоустройства. Был искусный оратор. Во дворце он с князем обсуждал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дела, издавал приказы и куазы, а за пределами дворца имел поручение по приему гостей и беседам с приезжавшими удельными князьями.

越译本：Цюй Юань по имени Пин происходил из рода правителей царства Чу и являлся одним из приближенных чуского Хуай-вана. Цюй Юань был весьма начитан, обладал сильной волей, хорошо разбирался в делах управления и в том, что касалось всяческих смут, а также был искусен в составлении различных указаов. В дворце он обсуждал с ван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дела и намечал

自欧洲人进入中国起，《史记》就被看成是了解中国和中国人的重要文献。

..... планы, готовил распоряжения и указы; вне княжеских покоев встречал и принимал гостей и беседовал с чужоу. Ван очень доверял ему.

作为文学翻译的阿译本改编了原文，译成俄文意为“屈原的故事”，且这里只取关于屈原的内容，而舍弃了关于贾谊的内容。而作为学术翻译的越译本，则先是以对音的方法逐字将原文中汉字注音来进行音译，之后再¹进行回译，回译为“屈原和贾先生的生平”（此处“先生”意指“老师”）。从译者的角度来看，阿译本注重译本的交际功能——面向普通读者故取平易的风格，越译本立足于译本为学术研究服务，注重原文的文化表现形式，注重源语文化，在力求使读者明确源语作者意欲表达的含意的同时，还以加注的方法，以洋洋八百余字介绍屈原和中国先秦诗歌，介绍诗歌中所体现的中国古代思想——老子、庄子思想，以及苏联汉学家波兹涅娃娃屈原的观点，接着还介绍了《史记·屈

原贾生列传》已有的俄文阿译本和帕译本、各类英译本、法译本、德译本、日译本以及中国的白话译本，并进一步介绍了关于《史记·贾生列传》的研究成果，介绍了屈原诗歌遗产的俄译本和俄译译者。大量的补充背景知识向作为学者的读者传递了充足的信息，从而充分保证了语际交际的成功。正文中阿译本作为故事性文学作品以简单直白的语言和口头叙述的风格使用短小的句式。而越译本则语言严谨，层次分明，译文紧扣原文，并加入了介绍中国古代文化背景的注释。

自欧洲人进入中国起，《史记》就被看成是了解中国和中国人的重要文献。俄罗斯人利用与中国接壤的便利，近三百年间积累下各种不同版本的《史记》，这些版本的甄别有待于中国学者的进一步挖掘。同时，俄罗斯人收藏《史记》的历史，间接折射了中俄文化交流的历史，为我们打开了了解俄藏中文善本典籍、了解俄罗斯人认识中国和中国人的角度的窗口。而俄罗斯翻译《史记》的历史，反映了俄罗斯人接受中国文化的历史轨迹。通过《史记》俄译本挖掘其中所体现的中外史观差异、中俄文化差异，《史记》俄译本为我们展开比较史学研究、跨文化研究、翻译学研究乃至中国文化“走出去”研究提供了难得的、重要的研究范本。

1 “回译指将已被译成另一种语言的文字再翻译回源语言的过程，也可以指将用另一种语言表达的源语文化再度本土化的过程”，见杨清波、杨银玲：《专有名词的汉译与译者的素养》，载《上海翻译》，2012年第4期，第65页。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科研资助项目介绍

项目名称：中国对阿拉伯国家大众文化传播策略研究

项目负责人：刘欣路（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

立项时间：2014年5月

项目介绍：

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国际传播“走出去工程”，在2013年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在此背景下，国内学界非常重视对国际传播的研究，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笔者通过国家图书馆和中国期刊网查询到，2000年以来出版的以“国际传播”或“对外传播”为题名的专著数量达到了230余本，而论文数量则达到了2400余篇。

但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发现，对国际传播理论、国际传播史、西方国家国际传播建设的研究占现有研究成果的多数，对中国国际传播建设的实际效果和提升策略进行分析和

评估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并且关注的焦点绝大多数是中国对发达国家的国际传播效果。至于对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阿拉伯国家的国际传播建设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还非常单薄，可挖掘的空间还很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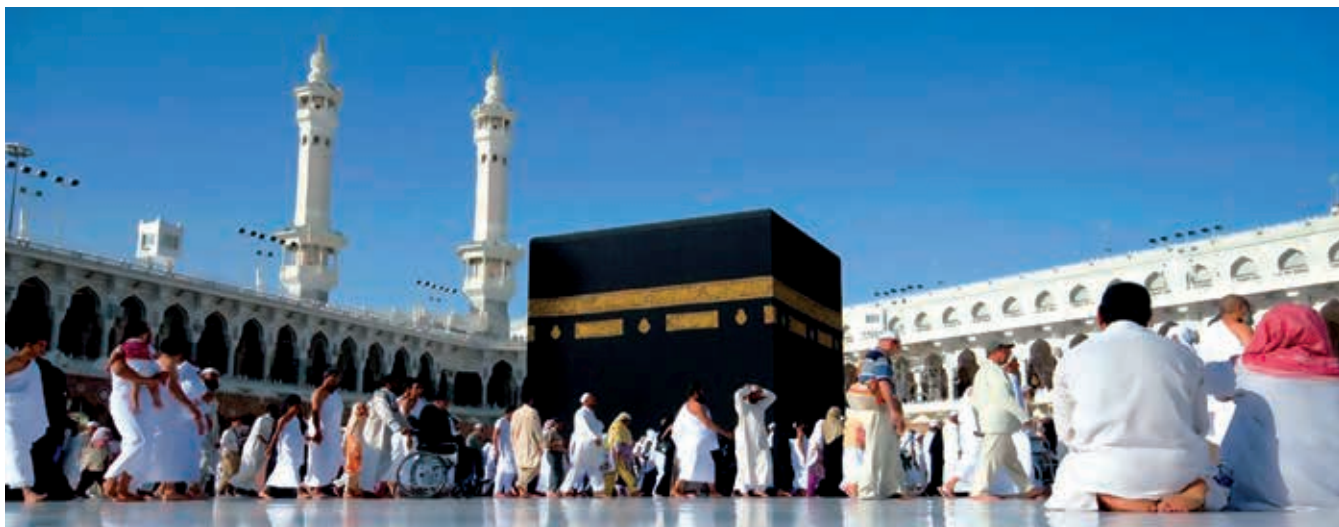
本课题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第一，开展大众文化国际传播研究符合国家总体战略的需要。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国际传播工作，明确提出国际传播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13年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大众文化传播作为国际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有效地吸引外国受众，增进对本国国情、文化、价值观、内外政策的认知与认同。因此本课题符合国家发展的需要，具有

较好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第二，将研究对象落脚在阿拉伯国家是对现有研究的丰富和深化。原全国政协外委会主任赵启正指出，国际传播研究应更加注重研究中国在世界不同地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国际传播，目前我国还缺乏此方面的系统研究。本课题把对中国和平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阿拉伯国家作为研究对象，符合当前的研究趋势。

第三，基于实证研究探寻中国对阿拉伯大众文化传播策略可为相关部门提供有益参考。国内现有研究成果往往设计宏观战略多、查找微观问题少，定性研究多、定量分析少，论自身经验多、谈对象国反应少。本课题将以实证研究为基础，通过翔实的数据、案例、问卷、访谈，探寻中国对大众传播的提升策略，为相关部门提供有益参考，因此具有较强的实际应用价值。



本课题将以大众文化传播理论为基础，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理想与现实相结合的原则，就中国对阿拉伯国家大众文化传播现状、制约因素、提升策略等问题进行综合研究，力求以实证研究为基础，拓展和深化对该问题的认知，为相关部门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参考。

本课题的基本观点为：通过多年的努力，中国已经建立起涵盖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对阿大众文化传播渠道，但从阿拉伯受众的反馈来看，传播效果还不尽如人意，阿拉伯受众对中国文化特别是现当代文化的认知还十分有限。这其中虽然有传播渠道认知度低、传播技术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距的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传播内容与受众需求存在差异。对此，我们应当坚持“内容为王”，加大对阿拉伯受众的文化背景以及大众文化需求的研究力度，从渠道、形式、内容等

方面多管齐下，提升对阿拉伯国家的大众文化传播效能。

本课题主要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中国对阿拉伯国家大众文化传播的现状。

第二部分：中国对阿拉伯国家大众文化传播的制约因素。

第三部分：阿拉伯受众的大众文化需求分析。

第四部分：提升中国对阿大众文化传播效能的对策建议。

本课题的重点在于：第一，通过翔实的数据和案例系统分析我国对阿拉伯大众文化传播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第二，结合阿拉伯受众的反馈意见以及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

本课题的难点在于：第一，要获得客观可信的研究结果须进行较大数量的调查问卷、访谈，这是本课题的重点也是难点之一；第二，现有的相

关研究成果所提出的对策建议往往是以偏概全或陷入经验主义的误区，如何实事求是地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是本课题必须解决的难点之一。

本课题的创新点在于：第一，研究内容上的创新点。目前，国内关于国际传播的研究方兴未艾，成果日渐丰富，但关于我国对阿拉伯国家大众文化传播的研究成果还十分单薄，可挖掘的空间很大，因此本课题在研究内容的选择上具有创新意义；第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点。国内关于国际传播的研究成果多是进行宏观战略设计，论证往往缺少第一手材料的有力支撑。本课题将采取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并充分利用精通阿拉伯语的优势直接获取在外国受众对中国大众文化传播的反馈信息，从而避免纯学理研究，力争使分析过程饱满，查找问题准确，结论客观可信，为有关部门提供有益的研究参考。



项目名称：亚洲安全环境分析

项目负责人：李永成（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立项时间：2014年5月

项目介绍：

一、选题意义与价值

当前亚洲所处的安全形势无疑是复杂而令人忧虑的，中日在东海的领土争端、中国与菲律宾和越南在南海的领土争端，都是极其棘手的问题，争端升级的风险亦有所增长。如何认识当前亚洲安全环境的基本态势及其主要问题，其根源是什么，如何缓解并塑造一个相对良好健康的亚洲安全环境，对这些问题提供既有学理性又有政策建言的学术成果无疑是极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学者对21世纪以来的亚洲安全形势有诸多研究分析，积累了非常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总体来看，有三个最有影响的研究路径：第一，大国政治角度的研究，以芝加哥大学的著名国际关系学家米尔斯海默及其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为代表，认为中国以经济发展和军事现代化为基础的崛起给东亚各国和美国都带来了安全竞争的压力，这些国家必须对这种竞争压力做出反应，亚洲安全环境必然走向复杂化，冲突甚或局部战争都有可能，颇为悲观，看不到出口在哪里

（*The Gathering Storm*, 2012）。第二，地缘政治角度的研究，以美国知名媒体学者罗伯特·卡普兰为代表，认为亚洲安全环境的当前困境和未来演变的根本原因是“地理的报复”，他们重在分析现实困境，但没有提供解决问题的方向（*The Revenge of Geography*, 2009）。第三，安全制度角度的研究，以一些自由主义学者为代表，如新加坡学者郑永年先生分析了亚洲安全困境的成因，提出以“亚洲的集体安全体系”来解决亚洲所面临的复杂的安全困境（《亚洲的安全困境与亚洲的集体安全体系建设》，2011）。

(二)国内学者对近年来亚洲安全环境的研究最有影响的主要有地缘政治、大国关系和美国的亚洲战略三个角度。第一,楚树龙先生为代表的学者以地理空间维度为标准,将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主要分为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西部北部方向,中俄解决了漫长的陆地边界,中、俄和中亚国家建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西北以及西部地区的不稳定因素;西南方向,中印巴关系处于相对稳定态势,即“北稳”、“西缓”。东部南部方向,东北亚地区中国与日本的东海争端,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南海争端都有愈演愈烈之势,即“东急”、“南动”。因而,目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压力主要来自海洋,海洋方面的安全威胁远重于陆地方向,构成了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新变化。楚先生提出的应对战略包括继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及“睦邻、安邻、富邻”地区、稳住美俄印主防日本、加强海洋力量建设等几个方面。(《当前中国周边环境分析与对策研究》,2013)第二,贾庆国先生为代表的学者从大国关系角度来分析亚洲的安全环境,他们以三角关系为学术基底,分析了中美日三边关系演变对亚洲安全合作的影响,对中美日在安全问题上的合作持乐观态度,进而强调三国安全合作可能性的增加无疑将有利于亚洲的和平与稳定。(《中美日三国关系:对亚洲安全合作的影响》,2000)。第三,也有若干学者以美国的



亚洲战略调整为视角研究中国和亚洲的安全环境,他们论证了亚洲安全环境的发展演变与美国的亚洲战略调整之间的高相关性,如刘飞涛的《美国“重返”亚洲与中国安全环境》。

三、研究的基本思路、主要内容与重难点

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是以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基底,描述当前亚洲安全环境的基本态势,厘清其发展演变的动力机制,进而以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理论和外交哲学思想来设计以良性安全竞争为核心的亚洲安全环境框架,防止各方的重大安全行为将安全竞争导向危机、冲突,以尽量避免大规模战争。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引论,交代研究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框架设计;第二部分,描述当前亚洲安全环境的

基本态势与主要问题;第三部分,分析当前亚洲安全环境发展演变的动力机制;第四部分,以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理论和外交哲学思想为基础,分析如何塑造良性的亚洲安全环境,强调外交妥协的根本重要性;第五部分为结论。研究的重点是第二三部分,研究的难点在第四部分。

四、主要观点和创新

本课题研究的主要观点:当前亚洲安全环境的主要问题在于以领土争端为载体、以民族主义情绪为催化剂的冲突风险大大增长,若干学者倾向于以建设亚洲的地区安全制度或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来解决问题,但这种方案不仅忽视了国际制度在改变国家行为进而缔造国际和平方面的严重脆弱性,而且面临远水解不了近渴的现实困境。因此,本研究将论证以理性与妥协为核心的现实主义外交哲学对改善亚洲安全环境的指导价值和现实意义,主张以理性妥协求良性安全竞争,这也是本研究的新意所在。

五、研究方法

本课题采用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现实主义理论为框架,以定性分析为基本研究方法,以文献分析、文本分析为基本研究手段,试图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和回答本课题设定的当前亚洲安全环境的基本态势、主要问题及其根源、如何建设良性的亚洲安全竞争环境等基本问题。

项目名称：斯里兰卡高等教育研究

项目负责人：马仲武（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

立项时间：2014年5月

项目介绍：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选题意义和价值

斯里兰卡国内高等教育研究主要集中在科伦坡大学、佩拉德尼亚大学等高校；所讨论问题主要有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模式、高等教育国际化和高等教育私有化等。近年来，斯里兰卡国内学界、政界和商界围绕“高等教育私有化”，尤其是“是否允许成立私立大学”这一问题展开了较为激烈的辩论。目前中国对于斯里兰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地缘政治、南亚国际关系、猛虎组织与斯里兰卡内战、僧伽罗语言文学与历史文化等领域。对于斯里兰卡高等教育的研究目前仍是国内斯里兰卡研究中的空白。受英国殖民统治的影响，斯里兰卡高等教育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1870年成立的锡兰医学院；1921年斯里兰卡便出现了现代大学体制。在斯里兰卡高等教育漫长的产生、发展、变革过程中经历了数次重大的调整和改革，积累了许多教训和成功经验。

由此可见，研究斯里兰卡高等教育，尤其是研究其历史沿革、管理体制和内部结构、发展现状和特点、未来发展趋势以及所面临挑战，不仅有



利于加强中国对于斯里兰卡高等教育的研究，填补这一领域的空白；而且顺应了时代发展和学术研究的需求，有利于通过总结归纳斯里兰卡高等教育发展的教训和成功经验，为国内高等教育机构以及高等教育管理机构提供参考，并为他们的决策提供一定的依据。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和重点、难点、主要观点和创新之处，基本思路和方法
“教育是立国之本”、“教育兴国”——这是当今世界各国领导人都

熟谙的强国之道。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教育不仅可以有效地提高国民素质和国家软实力，也是衡量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高等教育位于“教育体系金字塔”塔尖，其对国家与社会发展的重要程度更是不言而喻。

斯里兰卡历来是一个重视教育的国家，长期实行免费教育制度，即从小学到大学实行教育全免费政策。目前斯里兰卡人口识字率达到92.5%，为南亚区域最高。斯里兰卡高等教育已有近150年的悠久历史，高等教育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斯里兰卡仅有4所大学，70年代末至90年代，许多大学在政府的鼓励下相继成立。目前斯里兰卡全国拥有15所大学、9所研究院和7所研究生院，在校生人数超过10万，教职工人数接近2万。随着高等教育投入、招生规模和高等教育机构数量的增加以及教师队伍的扩大，斯里兰卡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教学科研水平、学科分类、教学设施设备等方面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和加强。

斯里兰卡政府鼓励国内高等教育机构与国外高等教学与研究机构之间建立交流与合作关系，以实现高校师



生互访和进行联合科研。斯里兰卡高等教育机构大多为英联邦大学组织和国际大学组织成员。目前与斯里兰卡正式建立高等教育合作关系的有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中国、印度、挪威、新加坡、瑞典、英国、美国等国家。

本课题拟通过对斯里兰卡高等教育发展相关资料文献的梳理和研究，从历史沿革、管理体制和内部结构、发展现状和特点、未来发展趋势以及所面临挑战等几个方面展开论述，深入探讨斯里兰卡高等教育发展历史、现状以及成功经验，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和研究提供参考。

本课题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如下：

第一，如何向国内介绍“斯里兰卡高等教育成功经验”。所谓“成功经验”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

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斯里兰卡高等教育成功经验”是结合斯里兰卡特定的时代背景、社会文化背景所总结归纳出来的，带有明显的斯里兰卡特色。因此，如何甄别有利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斯里兰卡高等教育成功经验”需要十分慎重。

第二，资料收集的完整性。斯里兰卡高等教育发展相关资料收集是否齐全、完整、可靠，需要进行仔细的资料筛选。这个工作需要的持续时间比较长，需要的前期准备比较繁复。

本课题主要观点和创新之处如下：

本课题着重对斯里兰卡高等教育发展相关资料文献进行梳理和研究，总结其成功经验；同时还将从历史沿革、管理体制和内部结构、发展现状和特点、未来发展趋势以及所面临挑战等几个方面展开论述。本课题的创

新之处在于深入探讨斯里兰卡高等教育发展历史、现状以及成功经验，并结合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现状和所出现的问题，为国内高等教育发展未来政策选择提供参考。

本课题基本思路和方法如下：

本课题研究方法的特色是历史分析和计量统计分析法相结合，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研究相结合，其基本思路如下：

第一，研究斯里兰卡高等教育发展相关资料文献资料，对之进行历史学和教育学的分析。

第二，在总结归纳斯里兰卡高等教育发展特点与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现状，为国内高等教育发展和研究提供参考。

项目名称：50 年来英国的中共党史研究——《中国季刊》的视角**项目负责人：管永前（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立项时间：2014 年 5 月****项目介绍：**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选题的价值和意义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麦卡锡主义的疯狂迫害，一部分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革命史的美国学者（如拉铁摩尔）转而至英国从事研究。在这种背景下，由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的《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于 1960 年在英国伦敦创刊，成为西方国家研究中共党史问题的重要学术刊物和主要阵地，也是当时国际中国学界唯一一份研究中国近现代问题的专门刊物。《中国季刊》创刊 50 多年来，发表了大量有关中共党史研究的专题文章、研究报告和书评，组织开展了关于中共党史重大问题的学术论争，先后出版了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系列丛书，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理解，长期以来影响颇大。

《中国季刊》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主要特色体现在，一是办刊的国际性，编委会成员除了英国本国学者外，还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人员，刊登的文章来自世界各地；二是研究内容的当代性，所刊文章主要反映 1949 年后中国共

产党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与中国国内的形势发展基本同步；三是与美国学界的互补性，英美学者经常双向流动，形成互补和依存，如第一任主编麦克法夸尔是英裔美国著名的文革史专家，而长期在英国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施拉姆则是美国人。可以说，《中国季刊》是英国乃至欧美学界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平台和窗口，推动了英国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应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然而，由于语言障碍、文化差异和研究资料不足，《中国季刊》还没有引起国内学者“应有”的重视，更鲜有人将它作为研究中共党史的新视角。

近年来，随着中英两国学术交流活动的进一步扩大，英国的中共党史研究已成为国内学界较为关注的领域。目前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开展基础理论问题研究。国内一些知名学者，如张注洪、侯且岸、梁怡、萧延中等从多个角度论述了开展英国中共党史研究的必要性、方法、意义等。第二，关注英国中共党史研究的专家，如施拉姆（Stuart R. Schram）、布莱恩·胡克（Brain Hook）、约翰·吉廷斯（John Gittings）等。第三，翻译英国中共党史研究的著作，如威尔逊的《周恩来》、

伊文思的《邓小平传》等。第四，评析英国中共党史研究的专题，如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起源、中苏论战考察、“文化大革命”研究等。

综上所述，国内学界对英国中共党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和丰硕成果。但是，目前的研究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一）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尚缺乏系统考察。绝大多数论著仅仅就英国某个中共党史研究专家的观点或论著进行介绍或评析，没有能够比较全面地把握英国中共党史研究发生、发展、变化的整体脉络、主要内容和基本特点。

（二）研究视角较为单一，缺少历史文化的取向。针对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同一问题，对于英国人不同于中国人的文化视角、思维方式还缺乏跨文化、比较性的深入思考。

（三）理论概括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目前，绝大多数研究还停留在翻译英国学者著作的层面，没有能够透过历史和文化的表层现象，进一步深入分析其学术传承、思维范式、文化取向等深层理论问题。

本课题以《中国季刊》为研究视角，立足于学术史的研究取向，考察中国共产党研究在英国的兴起、发展和变化的过程；立足于跨文化的研究取向，以学术个案探讨英国学者研究中共党

史的西方文化特点及影响。

二、选题的价值和意义 理论意义

(一)从学术史的角度,对英国中共党史研究的兴起、发展、变化做历史考察,进一步推进国外中共党史的研究工作。本课题以《中国季刊》的中国共产党研究为视角,分别考察不同历史时期英国学者的中共党史研究,并分析其思维模式、文化视角和学术传统,总结英国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脉络、主要特点和基本趋势。

(二)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新视角,推动国内的中共党史研究。“山外看山识中国”,英国学者的中共党史研究,可以为国内从事党史研究的学者提供新视角、新思路。

现实意义

(一)有助于汲取和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促进中国共产党的当下自身建设。

(二)有助于提升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减少国际交往中的文化误读和政治误解。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被世界理解,而我们只有首先了解西方的“中国观”、“中国共产党观”,才能实现有效地沟通。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和重点、难点、主要观点和创新之处,基本思路和方法 主要内容

(一)《中国季刊》对英国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贡献:(1)研究成果的

整理:梳理归纳《中国季刊》1960—2010年间发表的有关中国共产党研究的论文、专题报告和书评;(2)结合世界历史、中英关系史和《中国季刊》的自身发展史,对此期间英国的中共党史研究进行系统的分析,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划分不同阶段,总结各时期的研究特点;(3)总结《中国季刊》对英国中共党史研究的开创性贡献。

(二)《中国季刊》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相关专题:(1)关于中共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研究;(2)关于中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研究;(3)关于中共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研究;(4)关于中英关系的研究;(5)关于英国中共党史代表性学者的研究:如施拉姆、沈大伟等,总结其学术成果、主要观点及发挥的独特作用。

(三)《中国季刊》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基本特点:包括历史观、文化特征、价值取向、思维范式及“中国观”的变化,以此考察今天“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模式”等各种西方言论出现的历史文化根源。

(四)《中国季刊》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历史启示:通过分析《中国季刊》的中共党史研究对英国学界、民众的舆论影响和对英国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探讨今天和平崛起的中国,如何通过官方、民间、学界和媒体多种交流渠道,在国际上树立中国共产党的正面形象,争得有利的话语权。

重点难点

研究重点:第一,从学术史的角

度考察《中国季刊》对英国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贡献。第二,坚持历史主义,把人物和事件放在当时特定的“史境”中去思考,以事实为依据得出客观结论。第三,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归纳英国中共党史研究的基本特点和理论范式,实现个性与共性,具体与抽象的统一。

研究难点:本课题研究要实现三跨:跨语言——翻译阅读大量英文原始材料;跨文化——回归英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与思维方式;跨学科——跨越多学科的研究思维。

主要观点

(一)随着中国的崛起和逐步融入世界,在全球化的视域下,关于中共党史的研究不再只是中国学者的“专利”,远在大洋彼岸的英国学者也在讲述着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英国的中共党史研究也应纳入中国学术史的范畴。

(二)《中国季刊》对于英国的当代中国研究、英国的中共党史研究都具有开创性的贡献。只有摆脱“规范认识论”的束缚,避免带着有色眼镜去看待英国的中共党史研究,才能在西方学者的研究中得到应有的参考和借鉴。

(三)英国学者研究中共党史虽然有明显的政治服务功能,但其背后也有独特的文化功能与学术取向。

(四)《中国季刊》的重要启示是:只有客观地认识和研究中国,中英关系和英国自身的发展才能受益;失去客观的学术研究支撑,英国的对华政

策难免陷入僵局和误区。

创新之处

(一) 研究视角新：从学术史的角度，以《中国季刊》为切入点考察英国的中共党史研究，为深化国内的党史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二) 研究方法新：跨学科、跨文化、跨语言。

(三) 史料来源新：在英文原始文献中筛选挖掘第一手研究资料。

基本思路

(一) 文献研究。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整理《中国季刊》有关中共党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在此基础上，结合当时的国际形势、中国国内发展情况、英国学界和政界的变化，总结《中国

季刊》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脉络、主要观点、基本特点和开创性贡献。

(二) 专题评析。在把握基本研究状况的基础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英国学者有关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观点进行比较分析，对其研究范式、思维方式、学术风格等进行深层理论概括。

(三) 启示和影响研究。通过考察英国学者对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革命研究的不同视角，分析其对国内学界的启示；通过考察英国中共党史研究对英国学界、民众和政府产生的影响，分析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并对新时期提升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做出理论思考。

研究方法

(一) 文献研究法：对《中国季刊》50多年来发表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研究的英文原始文献进行梳理归纳。

(二) 比较研究法：将《中国季刊》与英国同时期其它中国研究的学术刊物相比较，如剑桥大学的《近代亚洲研究》杂志 (*Modern Asian Studies*)，概括其在英国学术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

(三) 跨学科研究法：涉及历史学(学术史、外交史、文化史)、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语言学等相关学科领域。

(四) 个案研究法：将英国研究中共党史最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如施拉姆、拉铁摩尔、马若德等作为研究个案。

项目名称：越南汉文小说中的中越史臣故事

项目负责人：吕小蓬(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立项时间：2014年5月

项目介绍：

由于历史原因，越南汉籍不仅遗存于越南，还大量地散落于法国、荷兰、日本等地，加之国际学术交流的障碍，国内外学术界对于越南汉籍的遗存状况一直所知有限，更无法全方位地开展深入系统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日趋活跃，中国域外汉籍研究勃兴，越南汉文小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在文献

发掘、整理、出版上取得了重要突破。其中，台湾学生书局于1987和1992年出版了《越南汉文小说丛刊》两辑，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了《越南汉文小说集成》20册，为越南汉文小说研究奠定了扎实的文献基础。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在越南汉文小说研究方面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两个方面：一是以文献学和小说史的研究方法，对小说的版本特征、作者情况、题材源流等加以辨证和梳理；二是以

文本对比和文化研究的方法，集中剖析越南汉文历史演义的文本、文化特征，指出其对中国古代历史演义写作传统的继承。台湾学者的越南汉文小说研究开展较早，陈庆浩撰写了多篇研究论文，其东亚汉文化圈的整体研究思路影响深远；陈益源的越南汉文小说文献研究和民俗学研究成绩斐然。大陆学术界在这一研究领域起步较晚，根据中国知网的收录信息，尚无相关博士论文问世。陆凌霄的《越

南汉文历史小说研究》(民族出版社, 2008)和任明华的《越南汉文小说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是迄今大陆学术界出版的仅有的两部越南汉文小说研究专著。不过,国内学术界对该领域的重视与日俱增,上海师范大学孙逊的“东亚汉文小说文献整理与研究”获得了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总之,越南汉文小说研究是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虽然国内外学术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但仍留有不少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丰富,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仍需拓展。

一、选题意义和价值

本课题研究视野开阔,将在文化整体研究的思路下,对越南古代汉文小说中的中越使臣故事进行文学和文化研究。在文学研究方面,以小说类型研究和文本细读为基础,对比小说中中越使臣形象的生成及其话语意义;在文化研究方面,着重揭示在越南古代历史文化的独特语境下对中越外交文化的构建与阐释。该选题的意义在于:第一,有助于开阔越南汉文小说的研究视野,拓展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对宏观把握越南汉文小说的文学面貌,深入剖析其文化特征,加强中越文学比较研究均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第二,为域外汉文小说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对学科建设起到助推作用。第三,总结东亚汉文化圈内的中越外交文化传统,对当今中越两国政府及民间友好交往不失借鉴意义。

二、研究内容

在全面地掌握小说文献的基础上,系统梳理和集中剖析越南汉文小说中的中越使臣故事。将使臣界定为国家使臣,集中关注宗藩关系的历史语境下越南汉文小说对两国使臣的书写。课题申请人前期已开展了文献搜集工作,对《越南汉文小说集成》20册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从而确定了以31个中越使臣故事作为研究对象。后续阶段还将以《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为参照,对研究对象进行适当补充与调整。研究主要内容包括:(1)越南汉文小说中中越使臣故事的类型研究;(2)越南汉文小说中中越使臣的形象研究;(3)越南汉文小说中中越使臣故事的文化研究。研究预期以论文形式完成,成果发表于国内正式出版的学术期刊。

三、主要观点和思路方法

课题选题新颖,以越南古代汉文小说中的中越使臣故事作为研究对象。在文献梳理和文本细读的基础上,提出越南古代汉文小说的使臣故事类型丰富,既有反映使途艰险、家庭变故的生活故事;也有使臣较量勇气与才智争取外交胜利的使命故事;还有使臣与两国文士诗文酬唱的友情故事;全方位地体现了越南士大夫阶层对中越外交关系的认知、对使臣活动在民间外交和政府外交两个层面重要性的阐释。本课题将借鉴比较文学形象研究的方法,通过小说文本与《明史》《清

史稿》《殊域周咨录》等中国古代相关史料文献的互文性对比研究,解读越南汉文小说对中国使臣、越南使臣形象所做的不同文化阐释,指出其折射的越南民族对自我与他者的认知与定位,揭示越南在民族独立过程中对中国文化的接受与抵抗。最后提出在宗藩关系的历史语境下,受到汉文化的强大辐射效应影响,越南汉文小说显示了以文化为媒介、以同中求异为手段、以平等对话为诉求的对华外交文化特征。

四、创新性

以越南古代汉文小说为切入点,结合文化整体研究的思路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对其中的使臣故事进行文学文化剖析。本课题的研究角度与整体设计有较强的创新性,笔者未见国内外学者有同类研究成果问世,因而具有学术前沿的探索价值,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域外汉文小说的学科建设,拓展越南汉文小说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五、重点和难点

本课题重点在于对越南汉文小说中的中越两国使臣故事进行系统梳理,以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方法解读文学文本的叙事话语,指出在古代中越关系的历史语境下,越南汉文小说中对华外交文化的建构与阐述特征。难点在于需要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文学文化的整体研究,对理论驾驭能力有较高要求。

项目名称：二战史观与冷战后东南亚国家的对日本外交

项目负责人：史泽华（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立项时间：2014年5月

项目介绍：

近年来，围绕“二战史观”的论争和斗争已经成为东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国家间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互动的焦点问题。其中，尤以各国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态度为最。面对日本国内极端右翼思潮不断抬头、篡改二战秩序之声持续高涨的情况，中国和韩国结成了意识形态“同盟”，不断通过各种方式警醒国际社会的麻木。在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之下，美国政府也做出了一些向日本施压的反应。但是，在二战时期同样受到日本军国主义侵害的东南亚，却未出现一致而强有力的批评之声。一些国家的态度甚至让安倍政府有了获得国际支持的幻觉。本课题试图借用政治文化研究方法，采取个体与整体相结合的案例调研方式，探究东南亚国家“二战史观”的形成过程及特点，并进一步挖掘其对这些国家冷战后对日外交的影响。

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文化是指“一国居民中当时盛行的态度、信仰、价值观和技能。”（《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1980）韦伯则认为，政治文化一般由“经验主义的信条、具有表达意义的象征物，以及决定政治



行动产生的环境的价值观念”组成，它可以“在政治体系中提供一种主观的倾向性”。政治文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外交价值取向。亚历山大·温特在其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称，不同的文化结构影响着国家身份的建构以及国家利益的认定，并影响国家的对外政策和行为。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甚至强调文化差异可能引发国家间的对立和冲突。

历史观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属于政治文化的范畴。在当今国际社会，“二战史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不仅代表着当事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事实的认知程度，还代表这些基本国家行为体对国际关系正义/非正义问题的基本价值取向，这对于本地区乃

至世界体系的走向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20世纪三四十年代，经过二战的洗礼，法西斯国家垮台，战胜国通过一系列的条约、协议、宣言及其它国际法文件谱写出了新的国际秩序框架，一直被尊重和沿用至今。

但是，对一些东南亚国家而言，“二战史观”经常因为这些国家丰富而曲折的历史而变得模糊不清，甚至“是非不分”。16世纪之后，东南亚国家相继沦为西方的殖民地，此后经受了长达四个多世纪的殖民统治。日本的入侵给一些国家带来了切肤之痛，另外一些国家的上层精英却将之视为“解放英雄”，泰国甚至加入了轴心国同盟。可以说，西方殖民主义和日本的侵略共同催生了东南亚地区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发展（《二战东南亚上层人士视日本占领军为“解放英雄”》，2012）。二战结束后不久，美苏冷战、东西对抗的氛围便很快笼罩了整个东南亚。一些国家因为与美国结盟而不得不“谅解”日本，一些国家因为与苏联结盟而更加“痛恨”日本。对二战后国际秩序问题的基本认知变得南辕北辙。

冷战结束以来，东南亚区域的国家间关系逐渐走向正常化。但在东南亚，许多国家因为日本的经济扶持而不再重视二战中的是非问题。还有一

些国家因为担心“中国威胁”而不得不努力维系甚至强化与日本关系的友好。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让问题变得进一步复杂化。从某种程度上讲，现实主义、均势、平衡等观念已经成了一些东南亚对外政策中的常用词汇。为了在大国安排面前“团结自强”，价值观问题经常也会淡出东盟的话语体系之外。当然，事实上，无论是政策制定还是实施，一个国家的

对外政策又不可能真正摆脱自己的“价值印记”。

安倍参拜靖国神社以后，虽然该政府利用“价值观外交”拉拢东南亚国家围堵、孤立中国的企图遭到了挫败（《东南亚敷衍日本价值观外交》，2013），但有些国家也未表现出对安倍拜鬼行为的反感。一定程度上讲，安倍政府“成功”地以西方民主价值观掩盖其在“二战史观”问题上的歪曲立场，

蒙蔽了一些东南亚国家。对此，中国国内一度发出了批评东南亚国家的声音，指责其见利忘义（《东南亚见利忘义 沉默应对安倍参拜》，2013）。然而，实际外交政策的实施远比批评复杂的多。只有对这些国家的“二战史观”问题进行足够深入的研究，才能弄明白此类外交政策行为背后的深层原因，进而找出更加理性的应对方法。

项目名称：文莱现行法律法规汇编

项目负责人：王文华（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

立项时间：2014年5月

项目介绍：

文莱是一个既古老、神秘而又年轻的“袖珍”国家，自1984年宣告独立并加入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以后，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着一定作用。同其他国家一样，文莱的法律制度经过长期发展已日趋完善并形成了颇具特色的风格与传统。文莱靠原油和天然气为主要支柱，总产值几乎占整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50%。在东南亚，石油储量和产量仅次于印尼，居第2位。我国和文莱于1991年9月30日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发展顺利，双方在各领域的友好交流与合作逐步展开。然而囿于对文莱法律制度环境不够深入了解，



双方合作的进度与深度有限。本课题将全面收集文莱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并对其进行梳理，从而切实有效地为我国“走出去”与文莱进行深度经贸合作和其他领域的法律合作提供法律资源方面的支撑，并为文莱法律制度的理论研究提供基础。这是选题意义和价值所在。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国内能检索到的有关文莱法学研究的论文主要是谢望原的《文莱的反贿赂法制》（载《法学论坛》1998年第1期），对文莱1982年颁布的《防止贿赂法》及其相关反贿赂机构作了较为具体的介绍。王志和、徐卫东的《文莱达鲁萨兰国立宪运动及其特点》（载



《当代法学》1993年第4期),对文莱1959年宪法进行专门研究。文莱确立的是以苏丹的行政权为核心的国家政治制度,国家采用君主制。这些研究对了解文莱的法制有一定帮助,但是由于相隔时间较长,且仅限于文莱的立宪运动与反贿赂法制,对当前我国“走出去”赴文莱投资、建设,与文莱经贸往来的法制资料储备与研究付之阙如。

国内能检索到的有关文莱法学研究方面的著作主要是梁立俊、莫洁玲的《文莱社会文化与投资环境》(2012)、《文莱达鲁萨兰国经济贸易法律选编》(2006)等,虽然这些填补了研究文莱法律资料的空白,但是两者涉及的一些重要法律法规存在着已经失效的现象,而且这些著作所介绍的法律法规过于侧重经贸方面的法律,对经商风险、可能带来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刑事责任几乎未有涉及。而国外的相关研究资料多为英文,且其立场、角度都不是中国本土化的,不能为中国投资者直接所用。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

主要包括:文莱的国家概况、法律体系整体概况、外商投资准入与待遇法律制度、外资企业注册与管理法律制度、外资企业市场运营法律制度、外资企业与当地社会关系法律制度、特别行业、区域的特殊规定或政策、外资退出与投资利益保护法律制度、经济刑法与投资风险评估、签署或加入的与投资相关的条约、公约等。

三、研究的重点、难点

既要在宏观上全面收集文莱的法律概况,又要在微观上收集最新、最相关的法律条文,并进行适当的法律责任与投资风险评估,从而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有切实的帮助,这些是研究的重点、难点所在。

四、主要观点和创新之处

(一)文莱的法律受英美法等国的影响较大,但是又有其本土化的特点,收集其法律信息时应予以充分关注。

(二)对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投资、贸易提供法律信息,不仅需要经贸、投资方面的法律,更需要“经商底线”法律,特别是经济刑法的规定及法律风险评估,这是中国企业尤其要注意的。不是有钱就能有一切,近年来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屡屡碰壁即为前车之鉴。

五、基本思路和方法

通过对文莱国家概况、法律体系整体概况、外商投资准入与待遇法律制度、外资企业注册与管理法律制度、外资企业市场运营法律制度、外资企业与当地社会关系法律制度、特别行业、区域的特殊规定或政策、外资退出与投资利益保护法律制度、经济刑法与投资风险评估、签署或加入的与投资相关的条约、公约等的全面梳理,采用历史的、实证的、比较的方法提出权威、有效的文莱法律资料汇编,不仅为企业投资,也为进一步的文莱法律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泰国现代文学史》



书 名：《泰国现代文学史》
作 者：栾文华（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
出 版 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8月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泰国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发展沿革及主要作家和重要作品，丰富了外国文学领域的资料积累，对于了解泰国文学发展脉络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又阐述了泰国华文文学、新诗及本国文学研究的状况，相信有兴趣的读者通过本书可以全面了解泰国这一与中国有着悠久历史渊源的近邻的现代文学轨迹。本书另一鲜明特色是对泰国近现代的重要作家及代表作进行了详尽、细致的介绍和分析，因此亦可作为相关专业的教材使用。

本书作者栾文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客座教授、泰国法政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主要著译有《东方现代文学史》（主编，与高慧勤合作）、《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东南亚文学卷》（主编并序）、《泰国文学史》，翻译有查·勾吉迪的长篇小说《判决》、西巫拉帕的长篇小说《画中情思》、短篇小说集《泰国当代短篇小说选》、《东南亚民间故事》、诗琳通公主的《我的留学生活》以及《泰国文学艺术》等。



亚洲研究动态
Asia Research Network

主编 郭婍庆 赵宗锋

编辑 王惠英

设计 大达期刊设计公司

E-mail: icwar@bfsu.edu.cn

电话: 86-10-88813845

传真: 86-10-88813842

地址: 中国,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2号,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 100089